改革开放40周年：
转变中的中国企业生态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声 明

本报告所述观点为报告联合编写团队的研究成果及观点，并不一定代表联合国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立场与观点。编写团队已尽可能确保报告引用内容及数据的准确性，但不为因数据引用所导致的任何后果承担责任。

致　谢

《改革开放40周年：转变中的中国企业生态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完成是团队合作研究的共同成果，凝聚着全体研究人员的智慧和心血。

本报告的作者团队主要包括梁晓晖、于志宏、郭沛源、郭毅和孙孝文，在此特别感谢他们的宝贵付出和支持！在本报告的研究撰写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先与国家信息中心区域发展研究院秘书长刘波先生给予本报告宝贵的指导评审意见，在此要特别感谢他们。同时，我们还要感谢凤凰卫视，作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战略媒体伙伴，凤凰卫视为这份报告的调研与编写提供了资金支持和国际推广的全媒体平台；此外，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凤凰卫视《龙行天下》节目制作人张晓文女士及其团队对本报告无私的帮助与支持。

本报告同时受益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内部评审流程。在报告研究最后阶段，驻华代表处开发经济学家Violante di Canossa以及驻华代表处经济学家石蓉从国际视角为本报告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审阅意见与支持，在此表示感谢。同时，还要感谢驻华代表处前同事、英文编辑安莎莎在报告校对编辑方面给予的支持。最后，我们还要感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国别主任白雅婷女士以及副国别主任戴文德先生在报告撰写过程中所给予的大力支持和指导。

本报告中的观点和见解不代表联合国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观点和意见。编写团队已尽可能确保报告引用内容及数据的准确性，但不为因数据引用所导致的任何后果承担责任。如果对报告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请联系报告撰写团队主编、驻华代表处可持续投资与商业部门负责人王亚琳（yalin.wang@undp.org）。

报告研究和写作团队

联合主编

梁晓晖	中国纺织信息中心副总经济师、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
王亚琳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可持续投资与商业部门负责人

章节主作者

第一章：

梁晓晖	中国纺织信息中心副总经济师、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

第二章:

郭毅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企业营商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第三章:

郭沛源	商道纵横总经理、商道融绿董事长
孙孝文	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

第四章:

于志宏	《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社长兼主编

第五章:

梁晓晖	中国纺织信息中心副总经济师、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
孙孝文	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
郭沛源	商道纵横总经理、商道融绿董事长

案例及附件 1、附件 2：

孙孝文	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

高级顾问

潘家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
刘波	国家信息中心区域发展研究院秘书长
Violante Canossa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开发经济学家
石蓉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经济学家

其它成员：

郑非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项目协调员
李雪妍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项目实习生
李佳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项目实习生

中文审校：

北京晟铭宏大科技有限公司

英文审校：

安莎莎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英文编辑顾问

目 录

致　谢---------- i

报告研究和写作团队 ---------- ii

执行摘要----------1

第一章 综述----------9

第二章 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企业生态演变---------- 14

一、1978-1991：政策性“放权”与渐进式改革路径---------- 14

1. 政策性“放权”---------- 14

2. 增量改革路径---------- 15

3. 企业生态渐趋繁荣---------- 16

二、1992-2001：“双轨制”与全面国企改革的推进---------- 18

1. “双轨制”的弊端---------- 18

2. “整体推进”与国有企业改革---------- 19

3. 改革进程放缓---------- 20

三、2002-2012：“入世”与中国企业的十年腾飞---------- 21

1. 政府与企业“谈判力”的相对变化---------- 21

2.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新概念的引入---------- 22

3. 现代企业生态初步形成---------- 23

四、2012至今：全面深化改革，追求可持续发展---------- 23

1. 完善管理体制, 推动国有企业适应市场---------- 23

2. 理顺行政关系, 深化政府职能改革---------- 24

3. 倡行可持续发展, 优化新时代价值追求---------- 24

第三章 企业生态的转变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27

一、市场意识的觉醒与社会观念的多元化（1978-1991年）---------- 27

1. 物质丰裕促进市场多元发展 ---------- 27
2. 多元新型社会议题开始涌现 ---------- 31
3. 环境污染促发多元环保立法 ---------- 32
二、企业潜力的释放与社会关系的重构（1992-2001年） ---------- 34
1. 市场参与者的经济角色重获尊重 ---------- 34
2. 企业成为社会关系的冲击者与重建者 ---------- 35
3. 环保污染治理激发可持续发展战略 ---------- 38
三、全球价值链的整合与社会力量的再平衡（2002-2012） ---------- 40
1. 跨国贸易倒逼本土企业责任 ---------- 40
2. 企业向善致力社会协调发展 ---------- 41
3. 环境挑战推动公众自发行动 ---------- 43
四、企业生态的新理念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2012至今） ---------- 44
1. 开放新格局与中国企业的全球影响 ---------- 44
2. 商界参与扶贫与互联网社会的新议题 ---------- 47
3. 绿色转型与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 ---------- 52
第四章 中国社会主要利益相关方对企业生态的作用 ---------- 59
一、政府部门 ---------- 59
1. 推动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 ---------- 59
2. 倡导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 ---------- 60
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 ---------- 65
1. 从经济援助到可持续发展 ---------- 65
2. 传播国际理念和交流实践经验 ---------- 66
3. 多方合作促进能力提升 ---------- 67
三、行业组织 ---------- 67
1. 倡导行业可持续发展战略 ---------- 68
2. 建立推行行业社会责任标准 ---------- 68
3. 系统支持企业社会责任实践 ---------- 69
四、社会组织、媒体及学术机构 ---------- 70
1. 社会组织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 71
2. 媒体营造“向善”的社会氛围 ---------- 72

3. 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和人才培养 ---------- 73
第五章 中国企业生态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关于未来 ---------- 77
一、开启政策引擎，激发高质量企业生态推动力 ---------- 77
二、强化主体作用，提升企业生态自我完善能力 ---------- 79
三、优化社会参与，完善企业生态外部支持系统 ---------- 80
附录 ---------- 83
附录 1：改革开放40年中国企业生态与社会发展大事记 ---------- 83
附录2： 中国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政策、规范、指南 ---------- 90
参考文献---------- 97

图表目录

图1-1：中国商业生态的三个层面 ---------- 11
图2-1：规模以上国有经济在工业增长中的占比 ---------- 21
图3-1：1979年-1991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 28
图3-2：1979年-1991年电视机总产量 ---------- 28
图3-3：1979-1991年份登记注册类型职工平均工资 ---------- 29
图3-4：1980-2000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 29
图3-5：中国农民工人口增长 ---------- 30
图3-6：中国不同产业就业人口分布情况 ---------- 30
图3-7：1987-1991年中国各级消费者协会受理质量问题投诉数量 ---------- 31
图3-8：1989-2017年中国防治工业污染直接投资额 ---------- 33
图3-9：1989-1991年中国企事业单位污染治理资金 ---------- 33
图3-10：1992-2001年中国分登记注册类型职工平均工资 ---------- 35
图3-12：1992-2001年中国公共图书馆数量 ---------- 35
图3-11：1992-2001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当年招生人数 ---------- 35
图3-13：中国广播人口覆盖率和电视人口覆盖率 ---------- 35
图3-14：1994年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共受理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和比例 ---------- 36
图3-15：1997年-2005年国有企业每年下岗职工人数 ---------- 37
图3-16：1992-2001年中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 38
图3-18：1997-2001年中国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排放总量 ---------- 38
图3-17：1992-2001年中国工业废气排放总量 ---------- 38
图3-19：1995-2001年中国工业污染治理项目当年完成投资 ---------- 39
图3-20：中国企业基金会公益事业支出 ---------- 42

图3-21：中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2004-2017年 ---------- 43
图3-22：中国建立《对外投资统计制度》以来各年份的统计结果---------- 45
图3-23：中国海外运营企业主要面临的挑战---------- 45
图3-24：中国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四种途径---------- 48
图3-25：半边山景区吸纳的本地劳动力月收入均值的前后变化 ---------- 56
图4-1：国资委推进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路线图 ---------- 61
图4-2：世界银行项目主题 ---------- 66
图4-3：基金会总数量趋势图 ---------- 72
图4-4："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文献的年度分布 ---------- 74

表格目录

表 3-1: 2015 与 2016 两年《环境保护法》新处罚措施实施统计 ---------- 52
表 4-1: 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行动 ---------- 64
表 4-2: 1998-2008 年中国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阶段划分 ---------- 74

专题目录

延伸阅读 1: 经济特区与中国企业生态的形成与发展——以深圳经济特区为例 ---------- 17
延伸阅读 2: 农民工与“民工潮” ---------- 30
延伸阅读 3: 中国个体经济发展——以温州乐清县为例 ---------- 31
延伸阅读 4: 民营企业家亮相全国政协会议 ---------- 34
延伸阅读 5: “破坏环境和资源保护罪”进入刑法 ---------- 39
延伸阅读 6: 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发展与争议 ---------- 41
案例一 : 格力电器参与国际空调标准制定 ---------- 46
案例二 : 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以碧桂园产业创新扶贫模式为例 ---------- 48
案例三 : 中国平安村医项目助力人本发展 ---------- 50
延伸阅读 7: 中国环境披露信息应用的四个阶段 ---------- 53
案例四 : 广东长隆集团探索保护野生动物新机制 ---------- 54
案例五: 宁波半边山生态旅游景区 ---------- 55

执行摘要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和人类发展方面成绩斐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从政府到企业，乃至整个社会，改革的影响涉及各个层面上的每一个人。本报告与《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周年版》互为补充，集结成册，关注的是中国经济和商业生态发生的切实变化。报告描述了各利益相关方在营造中国当前商业生态的过程中各自发挥了哪些不断变化的作用，他们又为可持续发展做出了怎样的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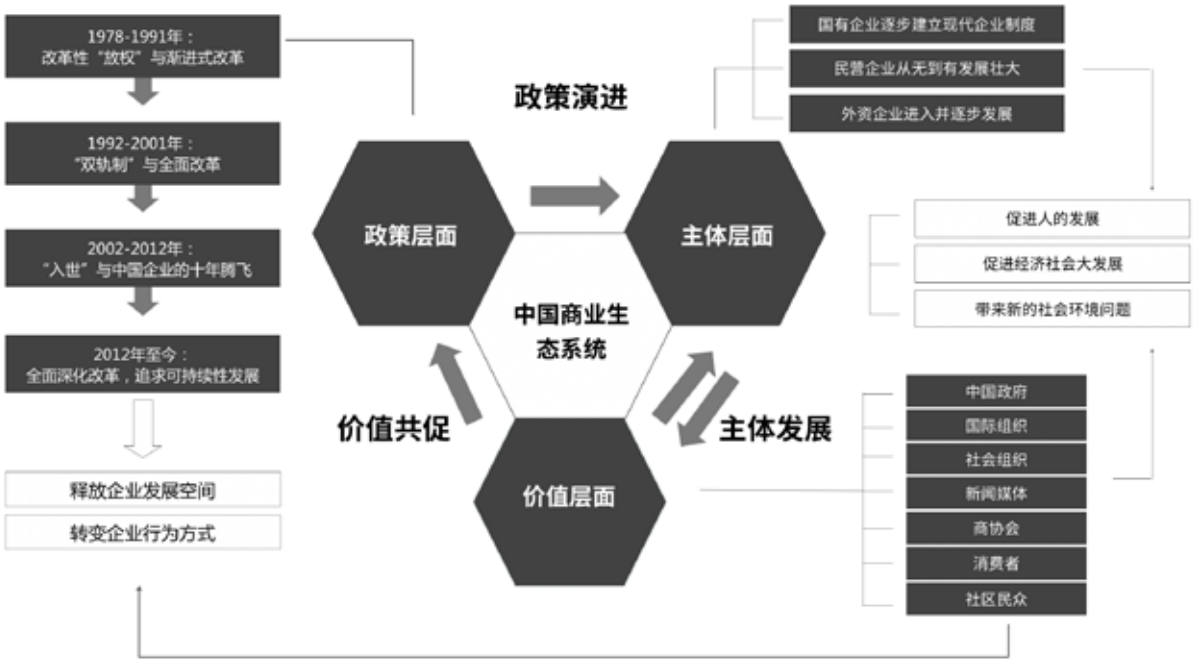
改革开放首先是一个经济命题。中国政府通过关键性的政策变革来鼓励投资，从而推动了企业结构和运作方式的转变，驱动了中国的快速发展。

本报告采用常见的划分方法将过去的40年分为四个阶段，描述了中国商业生态的演变（第二章）以及可持续、企业社会责任等理念的发展（第三章）。第四章介绍了中国可持续商业发展中涉及的各方力量。第五章对各利益相关方的未来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第一阶段是1978-1991年，其间政府迈出了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初步伐。“放权让利”的改革（1978年）为当时的国营企业松绑。这一举措使得企业获得了一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能够更好地响应社会需求，同时获得一定利润。这次改革激发了国营企业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但也造成一段时间以后出现的盲目扩大产能和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

通过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摆脱计划经济的改革措施也延伸至农业领域。这种

新的制度用合同制取代了过去的平均主义集体农业管理体系，允许农民自主选择保留或出售部分收成。改革成效显著，实施仅几年时间，生产力就得到了大幅提升。这项改革还将大批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推动了轻工业乡镇企业的发展。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蓬勃兴起，为后来的民营企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图：中国商业生态的三个层面

最后，正是在改革初期的这些年里，政府进行了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实验，通过建立经济特区，在部分地区实施了对外开放。经济特区这种新的商业生态在沿海城市发展并迅速繁荣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制度支持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

但同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形成了“双轨制”，扭曲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定价机制，阻碍了商业生态的进一步发展。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改革的第二阶段。政府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新的改革目标，出台了一系列财政、税收、金融和企业制度改革措施，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随后几年，中国的企业改制取得了重大进展，从以国有经济为主体，转变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很多国有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经历了全面的结构调整。

尽管发生了这些重大变革，但在构建让所有市场主体能够公平竞争的环境方面，进展仍然缓慢。因此，在九十年代，人们就国有企业应该进军哪些产业，退出哪些产业，政府对商业生活的干预程度和干预的有效性，以及不道德的企业行为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此外，这些年里，经济持续增长，但法律体系和市场经济企业文化的发展相对滞后，对

利润的疯狂追求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社会矛盾。

到了2002-2012年，也就是本报告所分析的改革第三阶段，这些力量和挑战与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的全球竞争压力相互叠加，带来了商业生态的又一次演变。随着中国企业积累的资源不断增加，在公共领域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可持续发展、负责任的商业行为、企业社会责任等新概念开始出现，中国开始引进国际标准和最佳实践，在经济特区以及特区以外的更大范围实施。现代商业生态逐渐开始形成。与此同时，企业的迅速发展和运营地域范围的不断扩大也需要加强监管，强化价值联系。这些要求成为过去十年，也就是2012年以来的第四阶段，也称为“新时期”，改革的核心内容。

首先，在这一阶段，国际贸易、海外投资和中国经济与全球供应链的深度融合为国有企业的迅速发展带来了宝贵的机遇。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在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展开，其目标是“根据当前形势和中国的特点”，推动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逐渐将国有企业转化为市场主体。

第二，进行了广泛的政府机构改革，优化机构设置和政府职能。改革推动了政府职能从行政管理向公共服务转变，更好地适应了市场主导的经济体制的要求。

第三，中国政府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了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搭建起推动国内、国际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框架。这是中国寻求经济增长与社会、环境可持续再平衡，“满足人民对更好生活的向往”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第三章切实关注可持续发展等理念的演变，以及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在这一演变过程中的作用。本章采用和第二章相同的阶段划分。

1. 1978-1991年：快速的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市场意识初现，但也面临新的社会和环境挑战

从1978年开始的第一阶段，中国人积累了可观的物质财富，生活水平大幅提高。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长，人们的消费模式开始升级，生活方式日趋多样。经济增长也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然而，经济增长也催生了新的挑战。假冒伪劣产品横行，让政府和公众开始更加注重消费者权益保护。劳动保护方面也出现了安全状况不佳、劳动条件恶劣等问题，而这一阶段，劳动者权益保护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此外，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环境监管不足，管理松懈，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乡镇企业等新的污染源层出不穷。政府开始采取行动治理污染，并将环保定为一项基本国策，为其建立了法律框架。

与此同时，经济社会发展为新主体的诞生提供了空间和机遇，这些新主体致力于让全社会共享中国的发展利益，其中包括政府支持的民间社会组织，他们开展各种公益项目和活动。正是在这次变化过程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1979年在中国设立了代表处。

2. 1992-2001年：释放企业发展潜能，激发社会新主体出现

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开始重视企业家、工人等不同利益相关方在商业生态中的价值，他们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得到了认可和强调。

这一阶段，此前的一些趋势仍在延续，如：一些企业枉顾道德和社会责任，疯狂逐利，导致损害消费者权益；劳动关系问题日益凸显；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和大范围的环境污染已殃及各主要人口密集地区；商业协会、基金会和其他民间社会组织在关注经济问题的同时，也逐渐开始关注社会问题。此外，企业社会责任的意识也有所提升。

3. 2002-2012年：融入全球价值链与社会领域的再平衡

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政府就供应链在中国社会责任领域的关键作用达成了共识。纺织、服装、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与国际接轨，采用相关管理制度和国际准则，推广最佳实践和更可持续、更负责任的商业行为。

这一阶段，中国企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有所提升，开始回馈社会，企业成为社会发展，以及经济增长新的推动力。

然而，经济增长使污染问题进一步加剧。公众的环保意识持续增强，治理污染的集体行动也开始增多。面对这些挑战，政府也加大了环境整治力度。

4. 2012年至今：商业生态新趋势与可持续发展的深入推进

最近一个阶段，随着“走出去”和“一带一路”等倡议的实施，中国的对外开放开启了新的篇章。中国企业在加快海外投资经营进程的同时也输出了一些环境和社会外部效应。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提出了环境可持续性等理念。“绿色一带一路”写入了政府的政策和战略中。此外，各商业协会还编写了海外投资指南和行为规范。

国内方面，在政府的政策引导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以产业扶贫、金融扶贫、技术扶贫的形式参与精准扶贫。这不仅推动了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拓展了企业自身的发展空间。

最后，尽管环境问题仍然严峻，中国已经在环保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这一阶段环境

治理方面的突出进步表现在公众参与增多，以及执法力度加大。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不断通过政策调整推动着商业生态的转变，企业得以释放其发展潜能，对社会发展和环境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企业的生产工艺和商业模式越来越多地受到政府、媒体、网民和消费者的监督，不断拷问他们追求的是一己私利还是公众利益。这迫使企业更负责任，更加努力寻求可持续发展，营造出以共同利益和共有的社会价值为基础的商业生态。

展望未来，整个商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对中国至关重要，而且，考虑到中国企业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对全世界也将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提出了一系列建议（第五章）。

1. 企业和投资者

为继续推动良性的商业生态和社会发展，中国企业必须将负责任、可持续的商业实践融入其核心商业战略。为此，中国企业应当：

- 将业务增长与企业所在社会的福祉视为相辅相成的目标；
- 要记住自身商业活动的影响和责任会沿着全球供应链延伸，影响到生产商、分销商及很多其他外部相关方；
- 在海外投资活动中要关注企业的环境足迹和社会影响。

中国企业作为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作为外国投资者，应该注重在经济、社会、环境等各方面处理好商业活动和社会关系。海外商业生态的构建，及其对当地劳动力、社区和社会的影响应该妥善处理。

总体而言，企业应投入资源与专业技能，寻求可持续发展，推动消除贫困、减少不平等和保护地球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对于相关企业而言，这种努力可以帮助他们提前达到未来的国内、国际监管要求，改善企业的公众形象，有利于营销，也有助于吸引和留住员工，节约自然资源可供未来持续使用。

2. 政府

政府在构建和规范商业生态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未来，政府应当：

- 改善政策框架，进一步为企业赋能，帮助企业充分释放潜能，推动经济增长，同时应

对社会和环境问题。

• 继续探索PPP等新的政企合作模式和市场化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利用自身的特长和资源为发展问题提出创新解决方案。

• 设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优先事项和里程碑，有效监控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进展，从而推动企业参与可持续发展。

3. 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

为了构建更加包容、更加环保的商业生态，使2030年议程与中国的长期发展目标形成合力，并加快中国的绿色经济转型，各联合国机构应当：

• 加大力度动员中国企业为2030年议程做出贡献，同时推动包容性的经济增长。

• 继续利用其全球网络和独特视角，建立合作网络，推动中国企业与各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双边、多边伙伴合作，设计和实施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各项举措。

• 加强有助于企业参与的知识与技能共享举措，包括与企业展开有效合作，衡量其对经济和人类发展的影响，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新方案。

4. 行业组织

商业协会和商会等行业组织已成为推动中国商业生态变革的重要力量。为应对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复杂问题，在领域内和不同领域间推广成功的举措，建议各行业团体：

• 推动行业层面的集体行动，通过对话和协商构建可持续发展共识。

• 制定自愿采用或强制执行的环境和社会最佳实践，为企业提供指导和参考。

• 组织能力建设项目，推广最佳实践，搭建交流平台，强化信息披露，从而增强企业能力。

5. 民间社会组织、媒体和学术机构

公众已逐渐开始参与社会治理，为商业生态的发展贡献力量。为有效影响企业的行为方式，改善其社会影响，民间社会组织、媒体和学术机构可以：

• 加强与企业的有效合作，提升可持续发展意识。

• 参与现有与企业开展对话的机制, 帮助各方识别其活动带来的社会、环境和治理风险, 合力寻找解决方案, 增进企业报告制度的透明度。

• 此外, 学术机构还应将可持续性原则纳入企业管理教育, 开发相关课程, 使现在和未来的商业领导者具备推动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技能和知识。

第一章

1

第一章 综述

2018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这40年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经历了翻天覆地的转变，而这种转变的核心就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到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1]。

另一方面，当我们深入探究这场改革的作用机制，不难在参与改革的各类主体间的互动关系上发现这场改革激发和传递影响的链条。首先，中国政府在政策方面的改革持续推动了作为经济细胞的企业界在构成、业务和行为方式上的变化；政策转变不仅是整个改革的“原爆点”，同时也是一系列改革的涟漪效应的终极推动力。其次，40年间，企业界在构成、业务和行为方式上的变化也持续地在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对中国社会和民众产生了深刻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而企业对社会的影响不仅仅是经济改革的溢出效应，很多时候也是社会变革的驱动机制。最后，变革中的企业界对中国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尤其是消极影响，也促使包括政府在内的参与改革的各类社会主体越来越关注企业及其影响，并以企业的利益相关方的角色积极反作用于企业的决策和经营，进而促发企业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调整。

1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 年 12 月 18 日，载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2018-12/18/c_1123872025.htm

首先，这一过程体现为中国决策者基于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理解和接纳，而通过一系列法律和政策，自上而下促发和引导企业界的变革，从而形成“政策层面的企业生态”。其次，随着政策的转变，传统计划体制内的“企业”逐渐获得了自主决策权，加上体制外民营经济、外资经济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使得中国的企业既成为落实经济改革政策的主体，也在此过程中通过不断增强的自由意志和自主决策进行合作与竞争，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企业在数量和规模上的扩张，企业群体也越来越成为社会生活的参与者和社会影响的制造者，从而形成了“主体层面的企业生态”。再次，企业界对经济、社会和环境日渐深刻的影响也使得政府部门、社会公众、供应链合作伙伴、金融机构、行业协会等企业的利益相关方相应从不同维度与企业开展互动，促使企业发挥出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积极而长期的影响，进而与利益相关方形成“价值层面的企业生态”。这三类企业生态联系了政策、企业与社会，也承载了这三者相互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它们既反映了改革开放的方法论，实际上也是其予以解决的发展挑战和所实现的发展成就。

这三组互动博弈的关系整体作为一个传动链条贯穿了改革开放的40年，而且从企业发展的视角来看，这三组关系实际上在不同层面推动了中国企业生态的构建与完善，这也使得改革开放的40年成为中国社会的企业生态在不同层面变化与发展的过程。我们认为，40年来中国企业生态的发展包括三个紧密联系的层面，即政策层面的企业生态、主体层面的企业生态以及价值层面的企业生态。

可见，对它们进行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与教训，并指导新时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上，企业生态的构建与社会、环境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中国政府对改革开放40年经验总结的一部分。例如，习近平在《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中强调，40年来，“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坚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2]。

1 同上页脚注 1

2 同上页脚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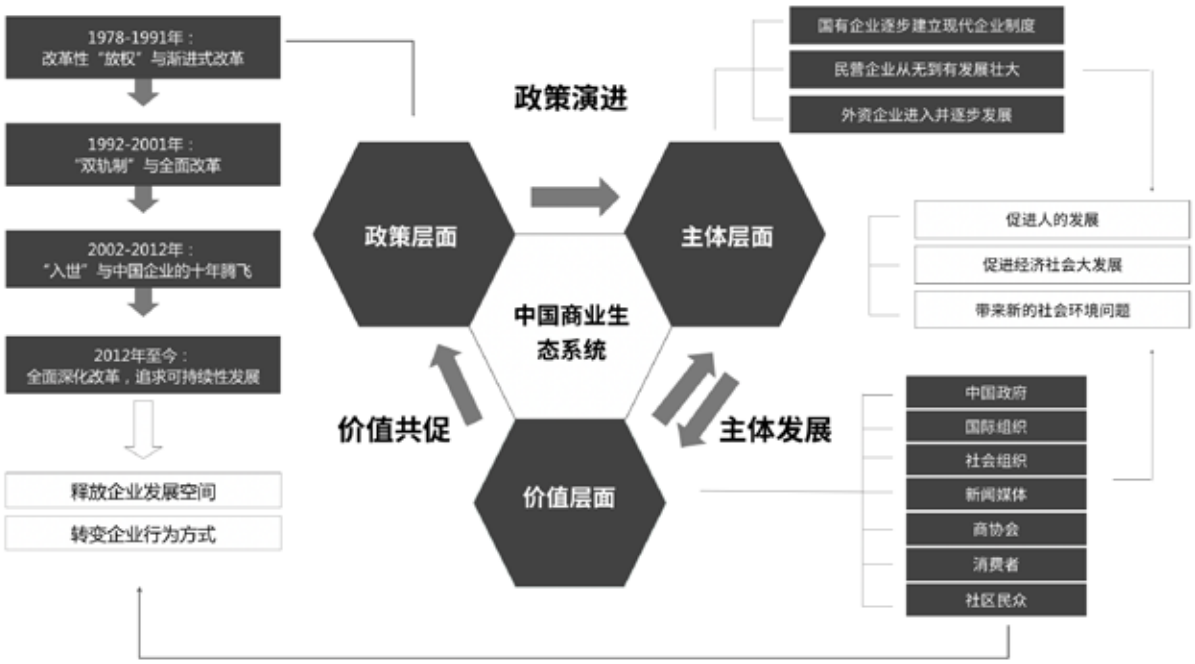


图 1-1：中国商业生态的三个层面

因此，本报告旨在通过详细回顾改革开放以来这三组关系的互动来展现40年来企业生态在政策、主体和价值层面的酝酿、构建和完善，以说明中国企业生态的转变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联系，及其对于中国和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启示意义。

首先，报告第二部分按照四个历史阶段的划分，分别说明了政策因素如何在不同时期推动了（政策层面的）企业生态的缔造，包括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性“放权”[1]如何催生了企业的增量，此后的国有企业改革如何为企业破除所有制对生产力的障碍，入世如何提升了中国企业的发展理念，以及近年来的全面深化改革如何推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其次，沿用第二部分的历史阶段划分并以经济、社会和环境作为分析维度，报告第三部分展现了不同时期转变中的（主体层面的）企业及其生态对中国环境与社会的影响，包括市场意识的觉醒如何促进了社会观念的多元化，企业生产力的释放如何更加显性化地从劳工、社会、环境等领域影响中国社会，中国企业与全球价值链的整合如何重构了中国的社会力量，以及企业生态的新理念将如何界定和影响社会发展的新时代。

再次，在第三部分充分展现企业生态的转变对社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报告第四部分则展现和分析了中国社会中对企业而言最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如何回应和反作用于转变中的企业及其生态对社会的影响，包括政府部分推动企业健康、负责任和可

1　关于“放权”改革，详见第二章第一节的分析讨论。

持续发展的政策路径，国际组织所引进的经验、实践与能力，行业组织为企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所开展的创新，以及各类社会组织对企业改善其社会影响所实施的社会监督、跨界合作与氛围营造等。这一过程也孕育并促发了中国本土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使其成为企业价值生态的重要养护机制。

最后，报告的第五部分着眼全球和未来，为未来通过缔造健康的中国企业全球生态促进中国社会和全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分别在政策、企业主体和利益相关方三个层面提出建议和展望。

• **政策层面，**中国政府需要通过有效的供政策供给进一步释放和激发企业生产力和活力；同时，构建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经济增长政策体系，促使经济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经济发展、绿色发展与人本发展并重。

• **企业主体层面**，作为企业生态的缔造者和参与者，企业应将社会责任视为一种异质性资源以及企业竞争力的来源之一，因此也应该按照兼顾经济目标和社会与环境影的基准方法认识并践行社会责任；同时，以可持续的生态理念处理供应链上的商业和社会关系。

• **在利益相关方参与和价值共促层面**，政府首先要将促进社会组织、媒体等不同社会主体的发展和成长作为构建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前提条件之一；其次，积极促进不同社会主体参与企业生态建设，有效配置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资源，提高整个社会生态的资源利用效率。

第二章

2

第二章
改革开放 40 年与中国企业生态演变

40年前，改革开放的引入首先是一个经济命题。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中国政府通过政策的变革对中国的企业界在构成、业务和行为方式等方面产生影响，进而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历程。也即，中国的决策者通过构建、完善和调整政策层面的企业生态而使得中国企业高效而持续地贡献于中国经济的增长。

一、1978-1991：政策性“放权”与渐进式改革路径

1. 政策性“放权”[1]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的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全民大讨论，从而开启了一场思想领域的解放运动。这场运动不仅促进了社会对计划经济时代的全面反思，同时也鼓励人们开启以否定传统“不合理做法”[2]为目标的行动实践。

经过多年的发展停滞，人们对于过去经济社会领域中存在的弊端有深切的反省，但对于未来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并不明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高层决策者选择了“摸着石头

1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政府采取了两项措施：一、增加国企管理者的经营自主权，即“放权”；二、通过允许国企保留一部分利润供自行支配，以增加奖金和福利的形式来加强激励措施，即“让利”。

2　这篇文章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推动了全国范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召开，以及日后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和思想准备。

过河”的试错探索改革路径。1979 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文件，一些省份据此文件精神开始选择符合条件的国有工厂作为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放权”，即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与主管部门之间的归属关系，通过减少并简化各类计划性指标，放松对企业的控制，赋予企业根据社会需求进行自身生产经营决策的权利；二是“让利”，即通过设立并扩大“奖励基金”[1]等办法，改变过去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收益统一归属国家的做法，允许企业实行一定程度的利润留成，从而给予企业及其职工物质激励。

“放权让利”的改革激发了国有企业[2]及其职工的积极性。到1980年，全国范围进行“放权让利”改革的试点企业扩大到 6600多家，产值和利润占全国工业企业的六至七成。[3]然而，在缺乏竞争机制、价格机制等市场机制的情况下，拥有一定自主决策权的企业并不能依照市场指针使用决策权，而是盲目扩大生产规模，随意使用各类生产要素，导致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也未能真正实现“增产增收”的预期目的，并在宏观层面上造成了财政困难和整体经济秩序的混乱。

2. 增量改革路径

在国有企业改革陷入困境时，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对改革的重点和方向进行调整，转向了改革阻力相对较小、较为容易取得成效的农村地区，开启了一条由“体制内”转向“体制外”，由城市转向农村，由国有企业转向非国有企业，由存量改革转向增量改革的新路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农村社队企业（人民公社、生产大（小）队）的生产方式将中国农民从传统以家庭为主的小农经济中分离出来，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初步组织化运营。但由于计划经济时期的社队企业（人民公社、生产大（小）队）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并且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利，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企业”。1980年9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了“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的做法[4]。随后短短两年时间里，以家庭承包制为基础的新型农业生产组织方式迅速在全国各地推广起来，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促进了中国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

1 “奖励基金”为 1980 年代国有经济改革的主要措施之一，指国营企业在实现一年内国家有关的利润规定后，留取一定比例归自己支配，并形成企业专用基金，用于发放职工奖励的机制做法。

2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将国家控制、经营的企业称为“国营企业”。1992 年 10 月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上，首次将“国营企业”改为“国有企业”。为表述方便，本报告统称为国有企业。

3 “国务院决定扩大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1979 年 7 月 13 日，载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historic/0713/2302.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5 日）。

4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采用的一项集体经济经营体制。该体制下，集体经济组织为发包方，农户为承包方，承包农户按照合同规定自主地进行生产和经营；其经营收入除按合同规定上缴一部分给集体及国家外，其余全部归于农户支配。

在此基础上，以集体所有制为主的乡镇企业也蓬勃地发展起来。由于中国农村隐性劳动力过剩，新兴的乡镇企业成了中国农村转移多余劳动力的重要方式。

从1990年到1999年，中国乡镇企业总产值从9581亿元增至100524.6亿元，年均递增29.85%，这期间，1993年总产值增长速度达到65%，为90年代最高峰[1]。据1998年不完全统计，全国有乡镇企业集团2000多万家，产值超亿元的大型企业5600多家。[2]

当“体制外先行”的增量改革战略在农业和农村中取得初步成功以后，中国领导人将这种经验推广应用于城市经济的改革。在不触动原有体制的运行逻辑，保持城市国有经济地位、作用基本不变的条件下，逐步放开对私营部门经济活动的限制，为民营经济的发展逐渐开拓出市场空间，与此同时，进一步对外来投资者开放国内市场，使非国有经济（民营经济、集体经济及外资经济）得以在国有体制之外发展起来。

3. 企业生态渐趋繁荣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政策规定，例如1981年7月7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1984 年2月27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农村个体工商业的若干规定》等等。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订方案，明确提出：“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3]为个体经济确立在国家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提供了根本法律保障。宪法修订案对于个体经济的地位进行重新认定之后，中国的个体经济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成为中国市场化进程中最富有活力的经济组成部分之一。

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整合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弥补建设资金不足，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创造有利于外商投资的营商环境，为各类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创造了良好的政策条件。1979年到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等重要法律规范先后制定，给予境外投资者明确的制度预期。政策条件的改善，加上中国丰富且训练有素的劳动力与相对低廉的要素资源，对境外投资者形成强烈的吸引力，大量的外资开始进入中国。这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产业结构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政策空间外，中央大力营造“经济特区”并实现区域性对外开放，在更大地理范围内促进现代企业生态的发育。

---

1 数据来源：整理自 1991 年至 1999 年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

2 转引自梁荣，唐坤炎：“90 年代中国乡镇企业发展的特点与原因”，《新东方》2000 年底 5 期，第 5 页。

3 198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99 年修正），第 11 条第 1 款。

为了突破“左”倾思想和固化体制的双重阻力，中国改革的领导者选择了东南沿海地区邻近港澳台，且没有传统重工业布局、计划体制影响力较弱的几个地区，充分发挥其海外华侨、华人众多，易于接受商品经济思想的优势，在传统体制力量较弱的边缘地带开启对外开放。到 20世纪90 年代中期，中国东部已经形成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梯级层次开放格局，从辽东半岛到广西沿海的东部沿海地区呈现连片式的具有很强市场意识和经济活力的地带。

延伸阅读1：经济特区与中国企业生态的形成与发展——以深圳经济特区为例

“经济特区”（Special Economic Zone）指一个国家内与该国其他地区具有不同的行政，法规和财政制度的地理划分区域。经济特区内所推行的这些特别政策制度通常涉及投资条件，税收和国际贸易法规等，旨在确保区内的商业环境较于该国其他地区更加自由，行政管理更为高效[1]。经济特区的最常见形式包括出口加工区、免税区、自由贸易区和工业园区。

深圳经济特区很好地体现了经济特区对一个国家企业生态的形成和发展所能产生的影响与作用。经过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后，中国于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并在不久后决定设立经济特区，以向外界开放，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于1980年5月，是中国成立的首个经济特区，紧随其后的是位于广东省和福建省的其他3个经济特区。

深圳特区等经济特区成功地成为了社会主义市场导向政策和机制的“试验场”。深圳在市场体系，企业合同工制、股份制、产权转让与破产、金融、税收、外贸、外汇市场建立、国有资产管理、土地使用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同时，经济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对出口国给予了优惠政策，在价格自由化，国有土地的有偿使用等吸引外资的政策方面在中国开创了先例，这使经济特区从计划经济的限制里解放了出来，并为中国的经济腾飞摸索了道路。在经济特区取得初步成功之后，一些经济政策制度也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其他地区陆续逐步推广。

在大量优惠的政策支持下，经济特区拉动了国内生产总值(GDP)，就业，出口，技术转让，外国投资等的快速增长。从1980年到1984年，深圳的GDP增长率达到了58%[2]；而同一时期全国的增长率为10%左右。此外，经济特区在帮助中国迈向更具竞争力的经济发展模式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86年至1991年，在深圳经济特区初步形成了以市场调节为主，以计划调整为辅的经济体系。同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涌入中国经济特区，在带动投资的同时，还带来了管理，技术方面的专业技能和知识。在鲶鱼效应和示范效应的双重驱动下，中国民营企业积极地从外资同行中汲取了养分，并实现了稳

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国际扶贫中心，《非中经济特区比较研究》，2015 年，第 15-16 页

2 曾智华：《解读中国奇迹：经济特区和产业集群的成功与挑战》，2016 年

步增长。此外，外资企业与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效率差距也推动了中国国有企业在产权和公司治理方面的深化改革。

虽然特区经济改革大大提高了人们的收入水平，但与创建较晚的经济特区的地区和没有经济特区的内陆地区相比，最早设立经济特区的沿海地区实现了更快速地发展。此外，随着人力资本等更多的资源和投入涌入经济特区，与内陆地区相比，沿海地区有更好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易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因此对外资更具有吸引力。这逐渐造成了不同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现象的加剧，引起越来越多的公众关注。为此，199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此后，1997年中共十五大的报告进一步重申并强调了相关原则。

总之，1978年到1992年的改革，是一种在没有预期目标条件下的转型路径探索，其核心逻辑是探求一种与计划经济完全不同的经济模式，并寻找一条阻力较小、转型成本较低的市场化发展道路。中国社会由原来的企业完全没有经营自主权，逐渐过渡到形成包括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种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而企业所处的企业生态，也逐渐在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改革综合实验区萌芽，由小到大，由点到面，逐步发展。在此过程中，政府的制度供给起到了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1992-2001：“双轨制”与全面国企改革的推进

1. “双轨制”的弊端

上述保持原有国有部门相对不变，而致力于促进民营经济发育和引进外资经济，发展区域性市场体制的做法，有利于在保持全国政治经济局面稳定的条件下，有序地推进改革，也使得改革过程中一些不可避免的消极因素，如下岗失业问题逐步地、缓慢地得以释放。增量改革战略创造了民营企业得以破土而出的条件，培育了市场和企业家，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然而，这也形成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格局。双轨制最集中的表现，是生产资料供应和价格的“双轨制”。这种“双轨制”客观上造成各类生产要素和商品存在着计划和市场两种定价机制，也相应形成了“计划价”和“市场价”两种价格及其之间不同程度的“价差”。

“双轨制”对于减少中国体制转型的阻力，促进市场体制的发育，具有重要的缓冲作用。但这种过渡时期的安排扭曲了市场价格机制，遏制了企业生态向更加深入和广泛层

面的发展。因此，要消除权力对于价格机制的扭曲和支配，建立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的企业生态，就必须消除这种过渡时期的做法，由局部改革转向全面改革。

2. “整体推进”与国有企业改革

1992 年初，邓小平作了推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南方讲话，奠定了改革开放的新起点。以“南方谈话”为基础，1992年10月，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1993 年 11月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打破思想束缚，不再将计划或市场经济调控手段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将改革目标确定为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提出了一系列财税、金融和企业体制等保障市场经济发展的改革目标。

要打破二元体制，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关键之一在于突破旧的所有制障碍，尤其是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而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阻力在于将国有经济比重大小作为判断国家社会主义属性强弱这一僵化的意识形态观念。针对这一问题，1997年中共十五大明确指出，“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需要坚持至少100年不动摇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1]。199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2]“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3]、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4]“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5]宪法的上述调整，不仅从根本大法上赋予各类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经济同等的法律地位，而且遵循这一原则，着手进行对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完善。

首先，依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要求，[6]对国有企业所处的产业和领域进行调整，国有企业的布局发生较大变化，逐渐从竞争性领域和与国民经济命脉关系不大的领域退出。其次，对于国有经济自身，也开始探索各种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

1 1984 年 10 月 20 日，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并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决定》还指出”实行计划经济同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统一的，把它们对立起来是错误的”。

2 199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 年修正），第 6 条第 3 款。

3 个体经济，指在劳动者个人或家庭从事的小规模的私有制经济。个体经济涉及面广，通常服务于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

4 198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 年）修正，第 11 条第 1 款。

5 198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 年）修正，第 11 条第 2 款

6 “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71380/71382/71386/4837883.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6 日）。

实现形式，大胆试用股份制、合作制、股份合作制、承包制[1]、租赁制等形式，力求解决国有企业“人格化所有者主体缺位”等问题。再次，以税收、金融等政策支持方式，鼓励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努力构建公平、有效的营商环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此后几年中，中国在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方面取得了不小进展。所有制结构明显优化，从国有经济一家独大变为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除少数行政垄断的行业外，民营经济逐渐成为比重最大的经济部门。这样，就在沿海各省逐渐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具有很大竞争活力的广大地区。

3. 改革进程放缓

沿海地区经验推广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到了21世纪初期，全国中小型国有企业，包括基层政府所属的乡镇企业已经全面改制，其中绝大部分成为个人独资或公司制企业。同时，推动建立公平、统一、有序的国内市场环境的深入改革进展缓慢，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首先是市场主体方面国有经济所处的领域和比重问题**。这是市场化改革关注的焦点。在涉及能源、电信、石油、金融等重要行业的国有垄断企业时，改革就显著慢了下来。围绕这类重要行业中国有企业究竟应当“进”还是“退”的争论又起。国有经济所处的领域和比重问题，关系到当时中国改革取向的核心问题。

• **其次是市场调控方式问题**。宏观调控要以行政调控为主要措施，由主管部委联合发文，采用审批等行政手段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的投资、生产活动进行直接控制。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各级政府部门纷纷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加强了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和控制，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则遭到削弱。

• **再次是市场生态的问题**。中国虽然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但是市场经济的若干重要架构，如规范的金融市场，以及现代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法治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通过突破法律底线和道德底线的方法，实现成本控制或者追求最大化利润，相应引发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权益问题、环境问题、安全生产问题和产品质量问题等等。这种低劣的竞争手段通过供应链和价值链的传导与乘数效应，严重破坏了营商环境和企业生态。

1 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中国公有制经济改革中采取的经营责任制形式之一，主要在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实行。1988 年 2 月国务院发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规定：“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在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以承包经营合同形式，确定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使企业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管理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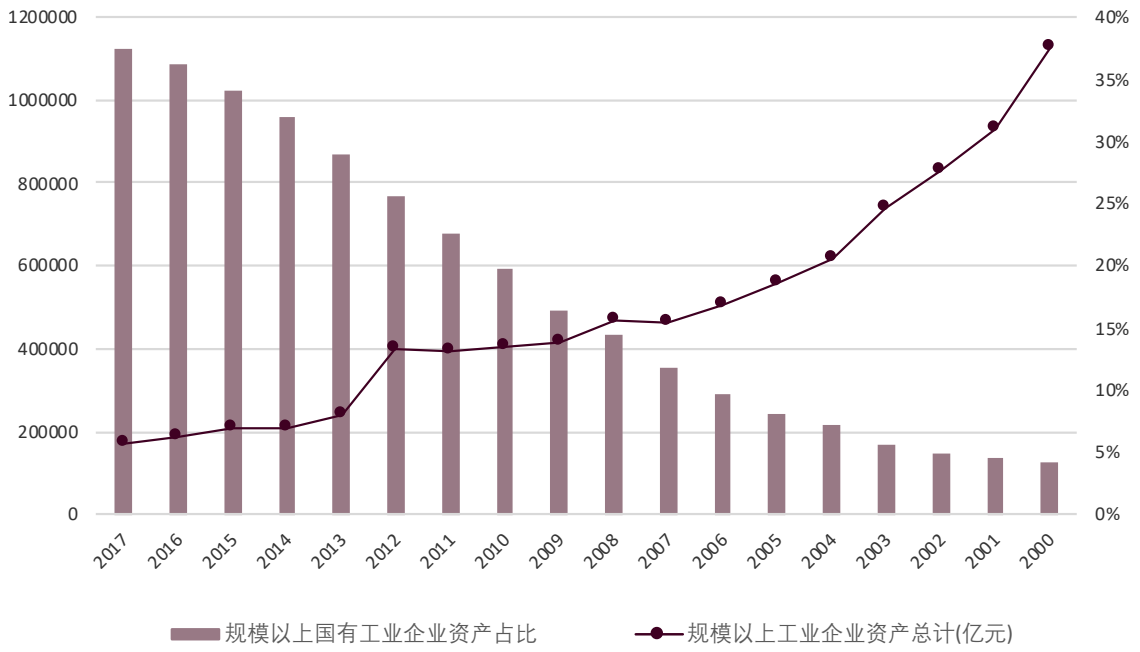


图 2-1：规模以上国有经济在工业增长中的占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注：1）1998 年至 2006 年，规模以上工业是指全部国有及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500 万元及以上的非国有工业法人企业；从 2007 年开始，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规定，规模以上工业的统计范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5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企业；2011 年经国务院批准，纳入规模以上工业统计范围的工业企业起点标准从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提高到 2000 万元；2）国有企业是指企业全部资产归国家所有，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的非公司制的经济组织。

三、2002-2012："入世"与中国企业的十年腾飞

1. 政府与企业"谈判力"的相对变化

自1978年中国开启市场化改革以来，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也是企业与政府角色、权力、职能等重新定位的过程。一方面，借助市场机制的发展与完善，许多企业积累出了巨额资产，在与社会的博弈中具有强势地位。例如，2008年中国四川省实现GDP1.26万亿元，在全国排名第九位，[1]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石化）2008年实现销售收入1.23万亿元，几乎与四川全省GDP相当。企业尤其是实现规模化发展的企业开始利用其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对社会生活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另一方面，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政府的能力范围和干预企业行为的权限与意愿随着国内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和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不断受到规范和约束。例如，

1 "四川省 2008 年地区生产总值"，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data.stats.gov.cn/search.htm?s= 四川 2008 GDP>（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6 日）。

随着政企分离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政府部门只能依靠财税等政策性手段从宏观上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而不能干预企业具体的经营决策。

政府监管部门自身的体制机制也无法适应中国市场化快速发展要求，呈现出各种局限性，突出表现为政出多门，“多龙治水”，重复执法和监管真空并存的局面。在企业实现资源积聚和社会权力扩张的同时，与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和企业文化的发展则相对滞后，导致企业缺乏相应的制度约束和行为自律，因此，企业行为的自我价值取向成为其影响市场和社会的关键因素。在三十年的改革进程中，中国政府更加侧重于培育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独立地位，而对市场主体价值观的培育则停留于一般原则上，没有在企业目标与实现政府倡导的“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等价值原则之间建立明确的对接机制和对标措施，从而也没有形成支撑市场经济本身所需的深植社会和市场行为的强有力的市场伦理和价值规范。

外部约束政策的滞后和内部企业文化建设的缺失极容易产生“没有灵魂的市场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企业的发展超越了政府规制的能力，那么企业逐利引发社会问题就不可避免。而这种局面的缓解，显然需要更大的结构性驱动力。

2.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新概念的引入

长期以来，中国在人口众多，技术水平相对低下的约束条件下，采取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发展高资源、能源消耗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由此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劳动者待遇水平和工作条件相对较差等问题。

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以劳动密集型为代表的制造业产品开始大规模进入以欧美为主的国际市场，此类问题的影响范围扩大。在为全球提供物美价廉产品的同时，也在观念、管理、运营模式等诸多方面接受来自国际市场的新要求。同时，随着众多发达国家将生产转移外包至低收入国家，如中国，国际社会上也出现了关于商业投资活动可能对这些国家的社会环境状况所产生的影响的讨论。

在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国后，中国企业在获得更多的商业投资机遇的同时，也开始肩负新的责任和义务。这一进程不仅需要中国企业接受来自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的运营体制的要求，同时也向中国政府对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赋权，和向政府自身监管行动的边界和范围提出新的挑战。

在中国企业融入全球供应链，与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联为一体的同时，劳工保护、人权、可持续等价值理念通过供应链向中国传导和渗透，对于飞速发展的中国和中国企业而言，是直面粗放式发展所带来的各类社会问题，构建健康和谐社会企业生态，

追求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为表达责任理念，形成责任共识，统一责任行动，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和社会组织制定了社会责任行动守则、行业标准或责任倡议，要求适用的供应商、分销商和商业合作伙伴等共同遵守，实现可持续的商业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中国企业也开始践行这些企业社会责任准则，对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这些规范准则在各类社会组织的监督下形成合力，避免企业之间将“不负责任”作为控制成本的恶性竞争方式，对于构建良性企业生态和“善”的市场经济价值底线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作用。

与此同时，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借助供应链进入中国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虽然是结构性的，且具有很强的驱动力，但同时也具有明显的被动性、临时性和片面性，因而这种外生性的社会责任机制长期以来都没有真正被中国企业接受，纳入管理，形成自愿、自觉、自律的行动。

3. 现代企业生态初步形成

尽管高速发展中的中国企业界似乎在这个阶段充分暴露出了“价值观危机”，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阶段，现代企业生态已经在中国初步形成。一方面，各类所有制、各个行业和各种规模的企业不仅都因为获得了更加适宜的政策环境而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而且各种企业之间逐渐形成了基于业务联系的产业链和生态圈。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行业、业务和地理方面的发展空间都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拓展，为中国企业构建和改善生态系统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可能性。同时，企业的快速成长和空间拓展也提出了更高的价值连接和秩序调节的现实要求。

良性企业生态必然建基于自觉的价值共识和自发的责任意识，否则企业生态不仅无法维持各个企业的发展，而且会对社会整体产生巨大的破坏性作用。2008年的金融危机正昭示了这一点。而随着出口在中国经济中的相对地位下降，以及中国内部市场中企业负面社会和环境影响的显性化和严重化，新的针对市场内在价值的改革也已经迫在眉睫。

四、2012至今：全面深化改革，追求可持续发展

1. 完善管理体制，推动国有企业适应市场

通过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中国经济与全球供应链的深度整合也为国有企业在21世纪初以来的快速成长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缓慢的国有企业改革也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

面为中国的市场机制和地位带来了挑战。为了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使之进一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于2013年11月9-11号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决定“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1]国务院国资委以此进行顶层设计，规划建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等，希望以此更有力地推进国有企业深化改革。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是将国有竞争性企业通过资本整合逐渐过渡为金融控股集团。对于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旗下的完全竞争性行业，在产权结构上国有资本无须保持绝对控股，可逐步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改革降低持股权重。在竞争性行业领域通过有效减少政府干预，减少行政审批流程，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和决策效率，从而增强了国有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此外，国资委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将不再直接管理企业，也不参与企业的日常经营，由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作为出资人实施对下属企业的管控。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作为国资委成立的集战略性和公益性于一体的企业集团分管国资委下属的功能性企业和公共服务类企业。从产权结构角度看，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可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逐步引入多元投资主体以增强企业活力，同时，从国家战略层面和经济安全层面出发，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则保持对功能性国有企业的控股地位。这一轮国有企业的改革，既意在尊重中国现实情况和国情特点，发挥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也希望遵循中国渐进式的改革逻辑，促进国有企业向真正市场主体的转化。

2. 理顺行政关系，深化政府职能改革

政府与企业关系变化另一个重要改革，是政府机构改革。基本原则是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设置，实现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这一改革既要解决市场主体面临的重复执法的问题，同时也要促进政府机构职能转变，使之由管理型政府向更适应于市场经济要求的服务型政府转变。

例如，针对自然资源所有者不到位、空间规划重叠等问题，由新组建的自然资源部统一对山水林田湖草进行整体保护和综合治理；通过整合长期分散在环保部等多个机构的生态环境保护职责重组了生态环境部，统一行使生态和城乡各类污染排放监管与行政执法职责，加强环境污染治理；原国家工商总局、质检总局、食药监总局等机构的职责此次被整合进新组建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3. 倡行可持续发展，优化新时代价值追求

1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116/c1001-23560979.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6 日）。

三十多年的高速和粗犷发展使得中国的环境、能源资源、劳动力等诸多方面面临严峻约束，无法承载经济增长模式的压力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1]

新时代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国政府明确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纳入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2] 2016年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注重将生态文明、绿色发展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关注发展的质量、效益、公平性和可持续性，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最终目标，充分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和内涵。[3] “十九大”更是将可持续发展提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要求“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4]

2015年9月，中国与其他国家一起支持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该议程契合中国新时代发展所追求的环境、人文、和谐等方面的发展理念，成为中国在国内外参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框架。2016年10月，中国发布了《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是全球大国中第一个出台相关方案的国家。2016年12月，国务院印发了《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提出形成若干可持续发展创新示范的现实样板和典型模式，对国内其他地区可持续发展发挥示范带动效应，对外为其他国家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中国经验。[5]2017年8月，中国发布了《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是全球最先发布进展报告的国家之一。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载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7-10/27/c_1121867529.htm>（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6 日）。

2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载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chinese/archive/131782.htm>（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6 日）。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载中金国研智库网，<http://www.zjgyzk.cn/fazhanguihua/china.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6 日）。

4 见上页注 1，习近平讲话，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6 日。

5 “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网，<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2/13/content_5147412.htm>（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第三章

3

第三章
企业生态的转变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企业生态的转变，而企业生态的转变也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经济发展对人产生的影响——企业生态的转变促进了经济成长与生活改善，因而直接促进了人的发展；二是对社会的影响——企业生态的转变带来了新的社会议题，也催生了新型社会组织和社会事业的发育；三是对环境的影响——改革开放初期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指导下，经济发展对环境造成了污染破坏，伴随经济发展的加速，企业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愈发复杂而深重。

一、市场意识的觉醒与社会观念的多元化（1978-1991年）

从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经济的变革促使中国社会逐步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大转变时期，从高度管制的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过渡，中国的社会结构、人们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逐步发生变化。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人们的物质生活逐步丰裕；在经济生活变化的同时，新型社会议题也开始出现。

1. 物质丰裕促进市场多元发展

第一，人们的消费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商品短缺时代逐步过渡到结构性过剩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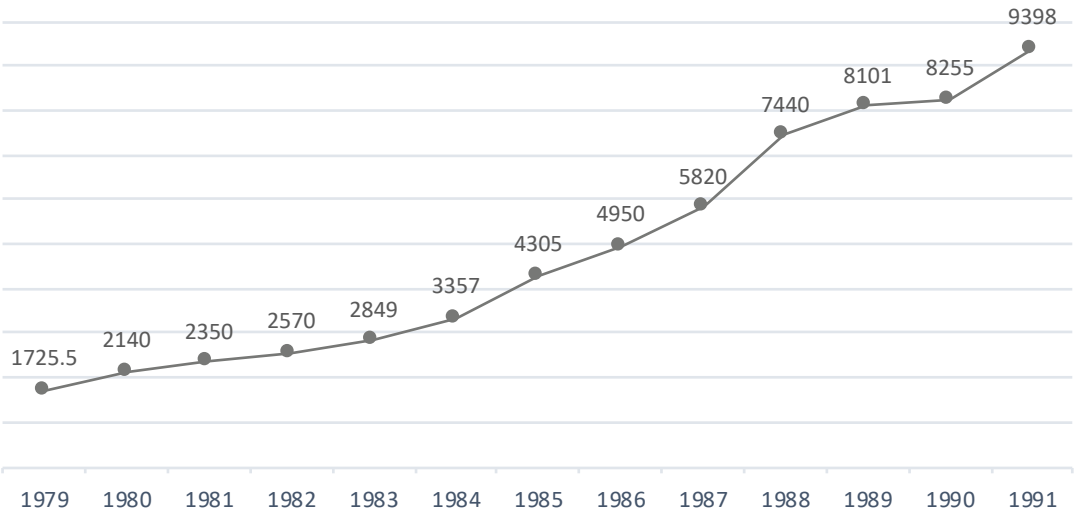


图 3-1：1979 年 -1991 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单位：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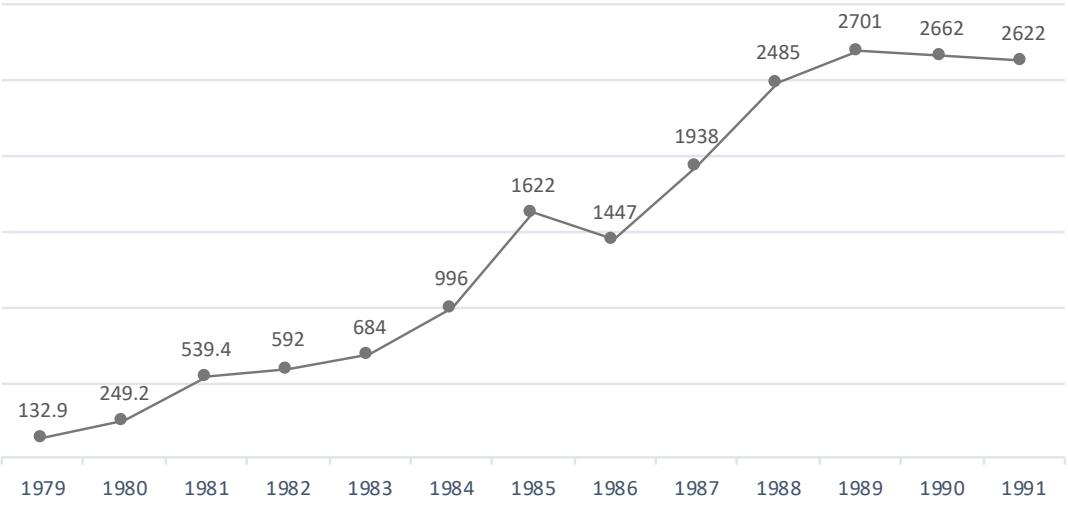


图 3-2：1979 年 -1991 年电视机总产量（单位：万部 / 年）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度统计公报整理。

代。随着消费者的货币收入逐步增加，消费能力逐步增强，消费市场迅速扩大，消费层次逐步升级，消费者购买趋势由生活必需品转向非必需品。

第二，伴随改革开放后的快速经济发展，职工工资水平逐步提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快速增加。家庭收入的增加带来了消费升级以及人们生活追求的多样化，人们逐步从讳言物质追求开始理直气壮的“追求富裕”，并且对精神消费的投入持续增加，导致“求知热”“留学热”等服务业市场的发育和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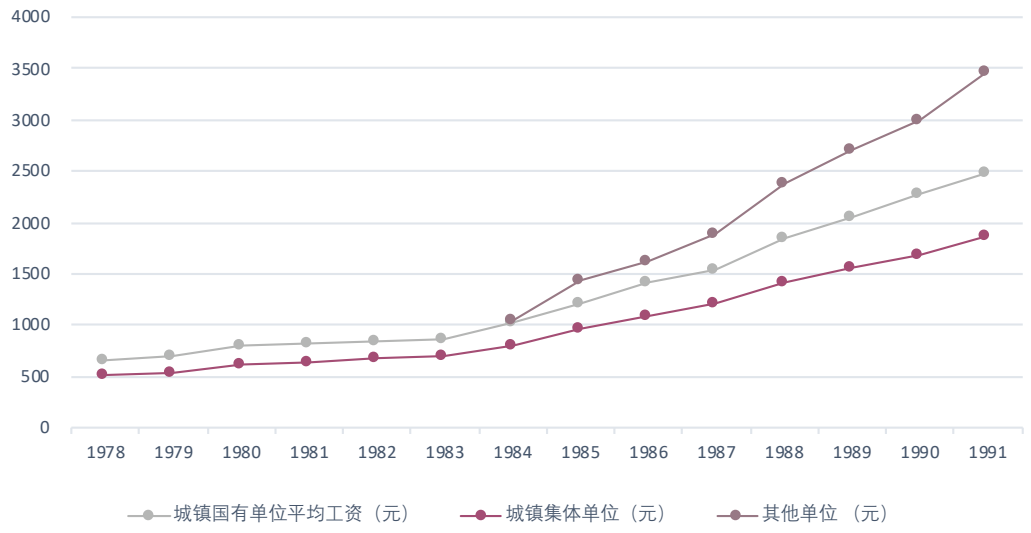


图 3-3: 1979-1991 年份登记注册类型职工平均工资(单位:元)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度统计公报,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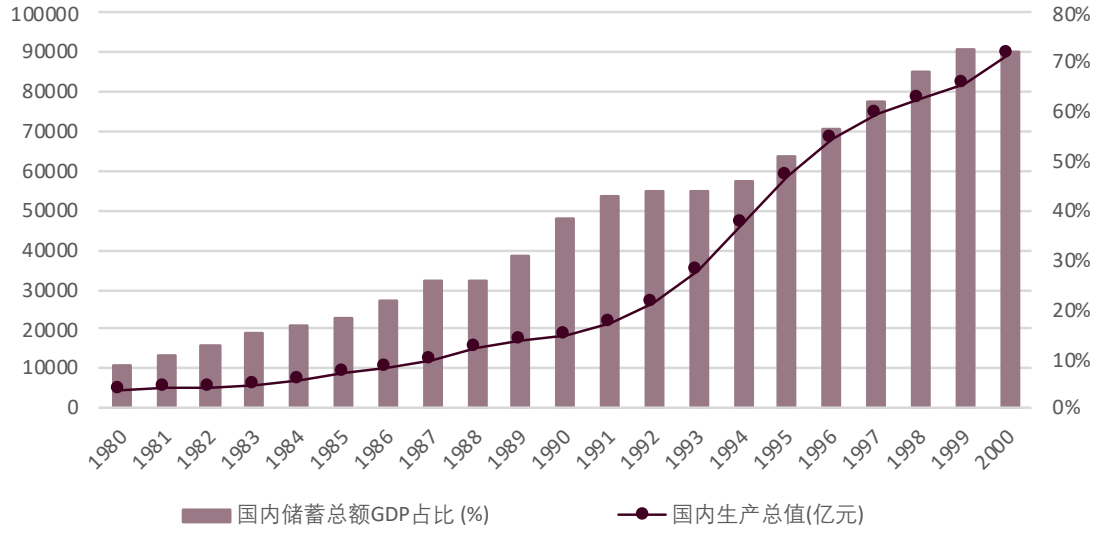


图 3-4: 1980-2000 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度统计公报,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

第三,人员流动与职业多元化。在农村,家庭联产责任制促进了农业生产,解放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同时,城乡发展差距又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乡镇流动。在城镇,个体工商户作为一种新兴职业开始出现,非公经济禁区开始被打破,大量无业人员和返城知青通过开展零售、服务等行业的个体经营实现了就业。此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就业。

延伸阅读 2:农民工与“民工潮”

农民工是伴随我国改革开放、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出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雨林在《社会学研究通讯》上的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农民工”一词。1978-1984年,少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沿海发达地区流动;1985年至1988年,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1989年春节前夕,“民工潮”首次出现;1990年底,全国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达到7000万。[1]农民工这一新的社会阶层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同样产生了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出现了“春运”、“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农村空心化”“春节讨薪”、“农民工权益保障”等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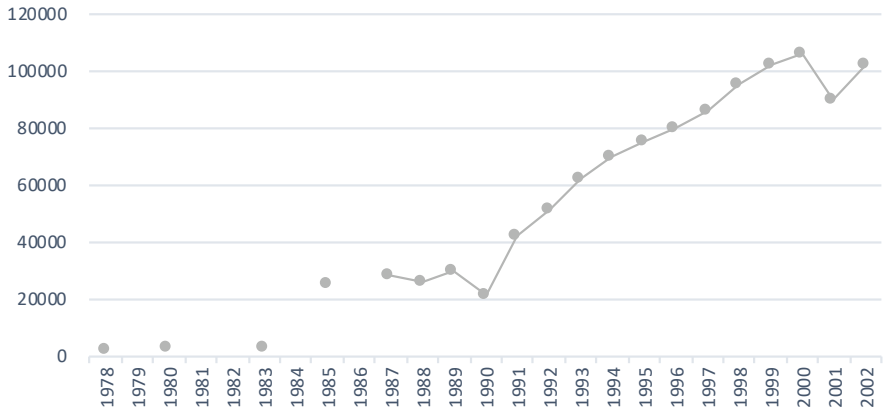


图 3-5:中国农民工人口增长(1978-2002)

注:1988 年前相关年度数据不完整;其中,1979, 1980, 1985 和 1987 年数据暂缺

数据来源:1987-2002 年国家数据统计年鉴,人口普查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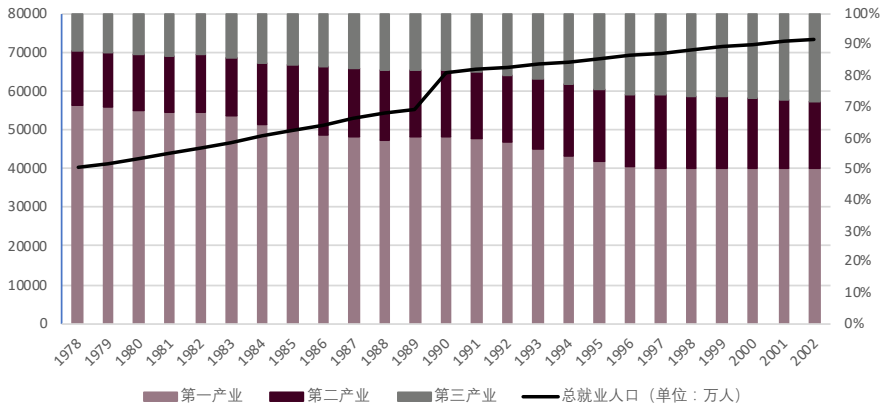


图 3-6:中国不同产业就业人口分布情况(1978-2002)

数据来源:国家数据统计局数据库

1 转引自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0 页。

2. 多元新型社会议题开始涌现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对企业的管理政策不完善，导致部分企业无序追求经济利润而忽视质量问题。

第一，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广告的出现危害了消费者权益甚至人身安全。一方面，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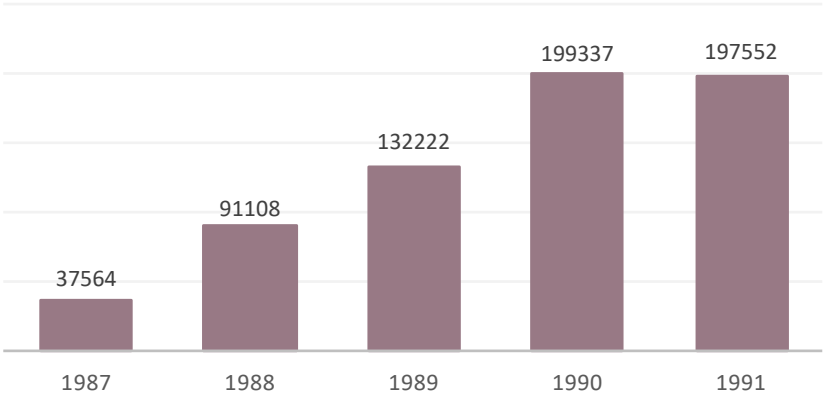


图3-7：1987-1991年中国各级消费者协会受理质量问题投诉数量（单位：件）

数据来源：丁世和："加强产品质量监督，保护消费者利益"，《消费经济》1992年第3期，第40页

延伸阅读3：中国个体经济发展——以温州乐清县为例

1978年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独特的地域文化影响下，温州市乐清县个体经济快速发展，出现了"村村点火、家家冒烟"的景象。1978-1990年，乐清县工业总产值增长10.7倍，年均增长22.8%，其中个体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据统计，1990年，乐清县工业总产值11.43亿元，其中国有经济1.07亿元，占9.4%；市属集体经济1.0亿元，占8.7%；乡镇办0.92亿元，占8.0%；村及村以下 6.88亿元，占60.2%。乐清县柳市镇也逐步发展成为全国的低压电器之都，但生产方式落后，产品质量差。1990年，国家七部委牵头组织对柳市镇低压电器产业的整顿。截至1990年10月20日，乐清县关闭了1267家经营无证、伪劣产品的门市部，注销了359家经销旧货门市部和186家无生产许可证企业的营业执照，查获无证、伪劣电器产品37064箱（件）。此后，乐清县政府"化危为机"，引领企业和个体工业实施产品质量提升工程，为电器产业发展奠定了质量根基。1994年，乐清县推出了"质量立市、品牌兴业"系列举措，低压电器产业逐步发展成为支柱产业，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天正集团、环宇集团、人民电器集团、华通集团等大型民营企业相继成立。

——节选自乐清市统计局：《改革开放40年乐清市工业经济发展研究》[1]

1 "改革开放 40 年乐清市工业经济发展研究"，载乐清市人民政府网，<http://www.yueqing.gov.cn/art/2018/5/31/art_1347884_18419126.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6 日）。

有企业推广承包制改革，企业的行为自由度加大，出现了乱涨价、将自身损失转嫁给消费者等问题；另一方面，个体和私营企业、乡镇企业由于设备工艺落后、生产管理落后、产品质量意识淡薄，导致假冒伪劣商品大量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政府到民间，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开始兴起。1984年12月，全国性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中国消费者协会在北京成立。

其次，劳工权益问题相继出现。一方面，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对企业放权让利，使承包者逐渐处于企业经营管理的中心地位，但由于改革配套措施的不完善，部分国有企业承包者片面学习、推广不良企业管理经验，严格管理工人，提升劳动强度，随意处罚工人、开除工人等现象开始出现。另一方面，私营企业、乡镇企业由于处于快速成长的初级阶段，在劳工权益保护方面存在“三个落后”，即设备和生产工艺落后，缺少必要的劳动保护；企业家个人的素质不高导致管理落后，忽视劳工权益保护；由农民转换的生产工人权利意识落后，认识不到自身的合法权益。此外，由于劳动立法不完善，合资、独资的外资企业中也存在劳工权益保护的“盲区”。因此，这一时期劳工权益保护明显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当时施行的劳工权益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针对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企业，未覆盖新生的非公经济领域。

第三，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为新型社会组织的出现提供了空间和机会。一是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中国与国际的交流日益频繁和深入，许多国际组织、部分国外公益性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开始进入中国，如1979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成立。二是部分官办的非政府组织开始设立，承担了政府管理收缩后留下的部分职能，如1987年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成立，在政府的业务指导下动员社会资源开展有利于解决人口问题的社会公益项目和活动。三是部分民间自组织开始出现，尝试解决新兴的社会问题，如1983年，北京市西城区大栅栏街道率先发起“综合包户”志愿服务。

3. 环境污染促发多元环保立法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加上环境监管的松弛与落后，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排放的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越来越多，而乡镇企业也成为新的污染源。根据国家环境保护局、农业部和国家统计局1991年12月发布的《全国乡镇工业污染源调查基本情况公报》，1989年，乡镇企业工业废水排放总量18.3亿吨，其中符合排放标准的仅占14.8%；年度发

生污染事故数2523次；乡镇企业“三同时”[1]制度执行率仅为14.4%。[2]

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环境污染问题引起了国家的关注，促发了政府的积极行动。一是环境保护上升为基本国策。在1983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国务院宣布环境保护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战略任务，是一项基本国策。二是逐步构建环境保护政策法律体系。197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第一次从法律上为实现环境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了保障。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1984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1987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1988年1月）等环保单项法律法规相继制定颁布，初步构建起环境保护的法律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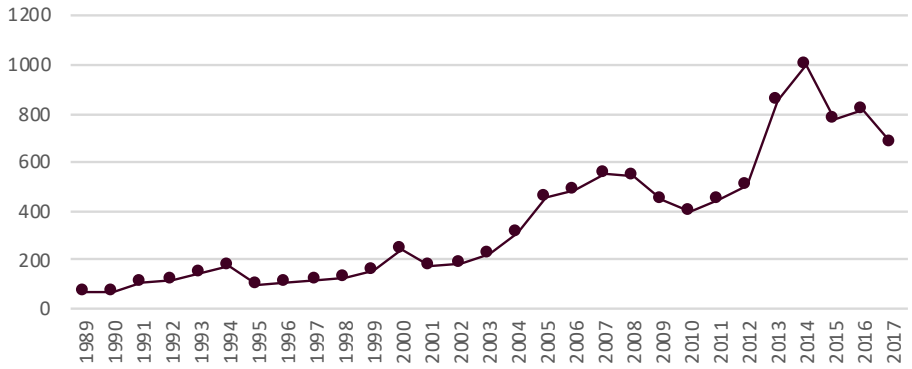


图 3-8：1989-2017 年中国防治工业污染直接投资额（不包括城市环境建设基础设施投资）（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全国环境状况公报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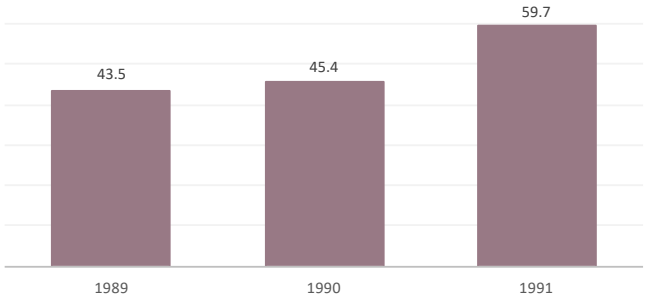


图 3-9：1989-1991 年中国企事业单位污染治理资金（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全国环境状况公报整理

1 ”三同时“制度是在中国出台最早的一项环境管理制度。最早根据中国 1989 年通过的《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全国乡镇工业污染源调查基本情况公报》，《环境保护》1992 年第 2 期，第 3 页。

延伸阅读 4：民营企业家亮相全国政协会议 [1]

1992年底，从全国政协传出消息，政协将吸纳一批民营企业家为政协委员。这样一来，很快各地通过相关渠道来确定委员的人选。当时的标准是，在非公经济群体中或所在的行业中，要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要爱国、拥护社会主义，要有社会责任感，守法经营等。1993年3月14日，刘永好、张宏伟、王祥林、李静等23名民营企业家，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出席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尽管在2093名的委员中，他们只占1%，但这标志着私营经济在时隔近40年后，重新登上中国参政议政的政治舞台。在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刘永好作为新经济成分的代表作了《中国的民营经济是有希望的》大会发言。

二、企业潜力的释放与社会关系的重构（1992-2001年）

1992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改善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出现了诚信缺失、劳工权益受严重侵犯、环境污染加剧等问题。

1. 市场参与者的经济角色重获尊重

第一，企业家的价值得到尊重和承认。对企业家价值的尊重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尊重。1988年4月，中国企业家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等国家有关单位举办的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评选揭晓，20位企业家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接受了颁奖。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家地位提升的标志性事件。

第二，劳动者的价值得到重视。随着区别于国家分配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国家开始重视劳动者的价值。1994年，《劳动法》推出，以界定和保护劳动者在工时、薪酬等方面的基本权利。截至1999年底，全国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并完善了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发布了最低工资标准[2]。此外，随着民营经济地位的提升和竞争的规范化，民营企业开始注重企业文化，尤其关注员工的价值和生产效率。

第三，企业家与劳动者等市场参与者的经济角色重获社会尊重，也使得与经济发展相关的精神需求和能力需求得到提升。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一方面社会物质丰裕程度持续提高，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1992年的10993.7亿元每年上升到2001年的43055.4亿元

1 张志勇：《中国往事 30 年》，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9 年版。

2 “1999 年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网，<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wgk/szrs/tjgb/200602/t20060207_69892.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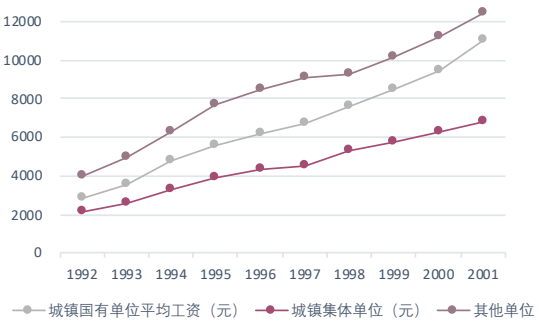


图 3-10：1992-2001 年中国分登记注册类型职工平均工资（单位：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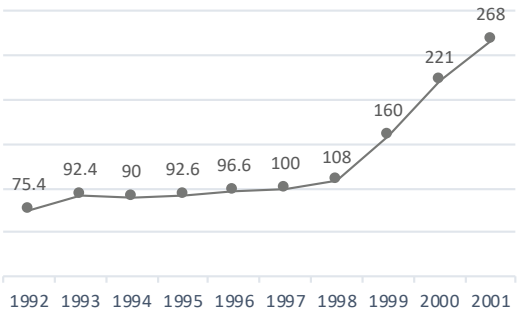


图 3-11：1992-2001 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当年招生人数（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度统计公报，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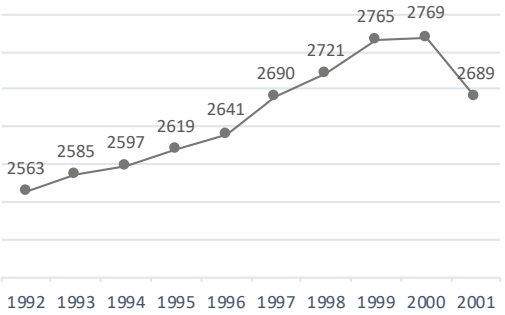


图3-12：1992-2001年中国公共图书馆数量（单位：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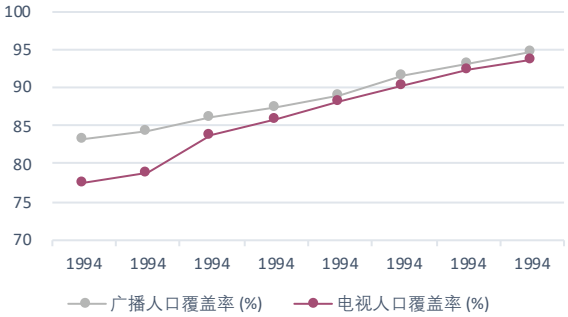


图3-13：中国广播人口覆盖率和电视人口覆盖率（单位：%）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度统计公报，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

每年；[1]另一方面，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不断增长，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改善。

2. 企业成为社会关系的冲击者与重建者

在市场参与者的经济角色重获尊重，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同时，企业及企业生态的变革还对社会产生了以下的影响。

首先，对利润的追求导致诚信缺失，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凸显。1992年以后，中国商品经济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潮，商品数量明显增加，但商品质量问题依旧严重，消费市场假冒伪劣商品横行。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统计，2000年，全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共查

1 “1992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data.stats.gov.cn/search.htm?s=1992 社会商品零售 >（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2001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data.stats.gov.cn/search.htm?s=2001 社会商品零售 >（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处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案件23.05万件,受理消费者申诉案件44.6万件。其中,个体工商户、集体企业、私营企业成为制假售假的三大主体,这三类经营主体制假售假案件总计12.63万件,占案件总数的54.80%[1]。

其次,劳动就业体系复杂化导致劳工问题凸显。尽管已有一定程度的劳动保护立法,但由于其严重落后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且执行乏力,导致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到乡镇企业等所有性质的企业均产生了重大劳工问题。根据《1994年劳动事业发展年度公报》,1994年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共受理劳动争议案件19098件,比上年增长54.5%;其中,国有企业8763件,外商投资企业2974件,分别占总数的45. 9%和15.6%。[2]此外,自1994年开始,国有企业开始推进现代化改革,逐步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减员增效",国有企业下岗职工逐步增多。但由于当时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下岗职工保障水平低,社会问题日益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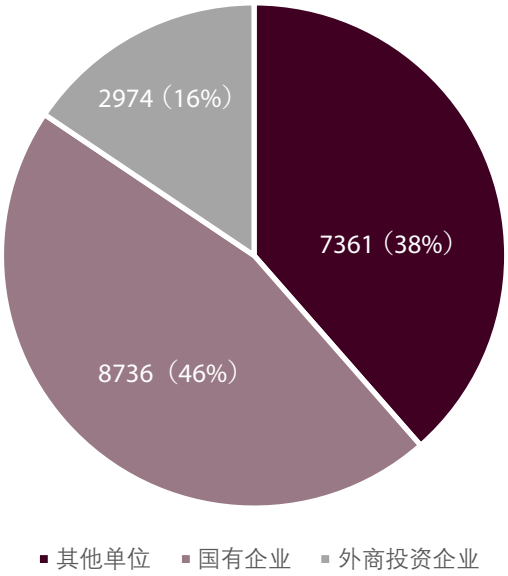


图 3-14:1994 年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共受理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和比例

数据来源: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年度统计公报整理

1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2000年查处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和侵害消费者权益案件情况分析",《中国工商报》2001年03月17日,第A02版。

2 "1994年劳动事业发展年度公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网,<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wgk/szrs/ndtjsj/tjgb/201107/t20110723_69883.htm>(访问日期:2019年8月1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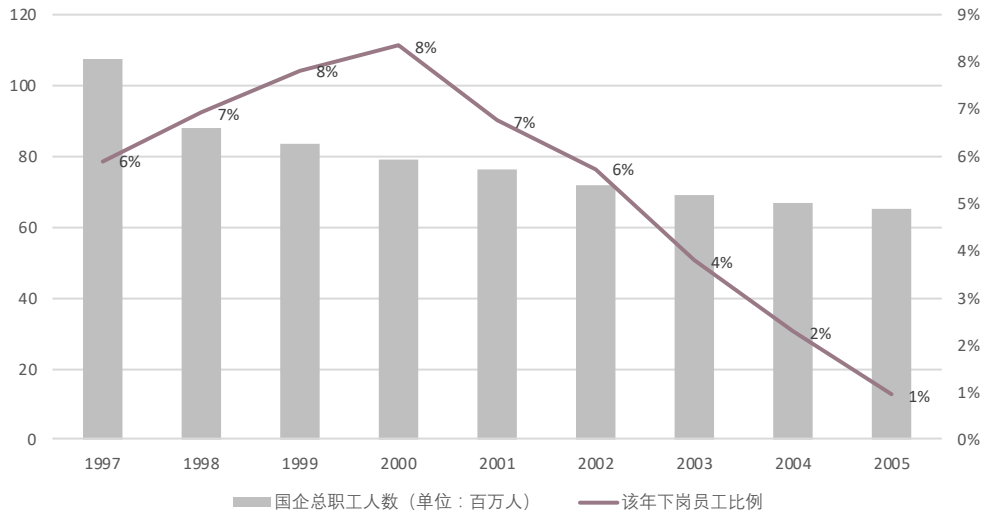


图3-15:1997年-2005年国有企业每年下岗职工人数(单位:百万)

数据来源: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年度统计公报整理

第三,伴随着政府转型与企业影响所导致的社会问题渐趋严峻,新型社会组织大量出现。1993年、1998年和2002年政府三次机构改革后,社会组织承担起了政府授权和委托的职能,新型社会组织大量出现,如中国轻工总会、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等商协会组织,以及中华慈善总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等大型公益团体。根据《2001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01年年底,全国共登记社会团体12.9万个;其中,全国及跨省域活动的社团1687个[1]。新型社会组织一方面承担了大量的由于政府职能收缩而带来的"真空地带"的管理和协调工作,另一方面,新型社会组织成为连接政府、市场与个人之间的纽带,将逐渐多元化的社会以一种新型的方式再次连接起来。

第四,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包括企业在内的不同社会主体开始关注并介入社会发展事业。1994年,在全国工商联七届二次常委会上,10名民营企业家联名发起了"光彩事业"[2]。1998年,我国长江、松花江流域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洪涝灾害,在抗洪抢险过程中,以企业为主体的各类社会组织踊跃捐款捐物,捐赠共计约115亿元人民币。为鼓励、规范公益捐赠行为,1999年6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

1 "2001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官网,<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b/200801/200801150093949.shtml>(访问日期:2019年8月19日)。

2 "中国光彩事业"由中过共产党中央统战部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ACFIC)一同发起,由中国民营企业具体组织和实施,旨在响应中国政府与1994年实施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促进民营企业投资并抗击地区贫困,实现共同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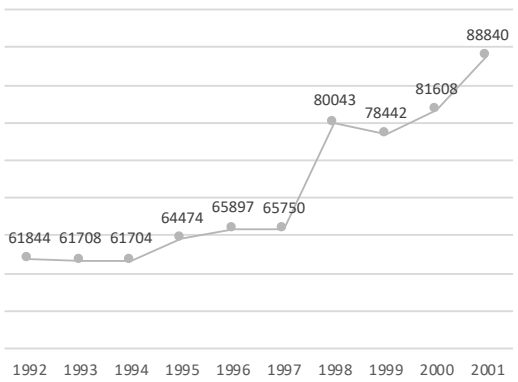


图3-16：1992-2001年中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单位：万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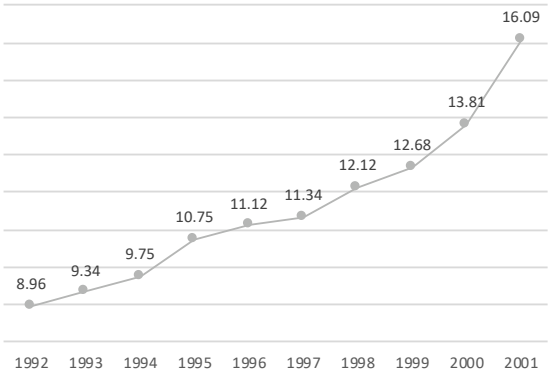


图3-17：1992-2001年中国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单位：万亿标立方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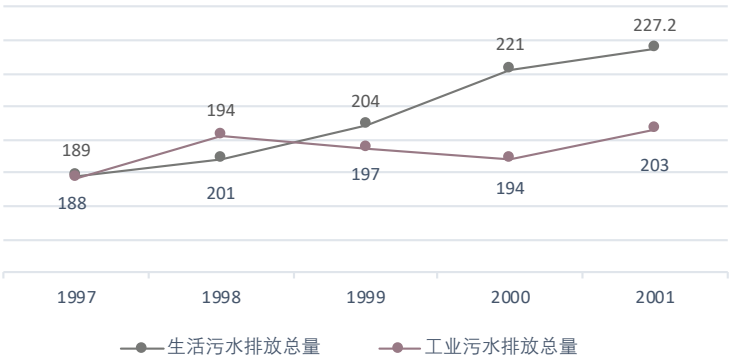


图3-18：1997-2001年中国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单位：亿吨）

数据来源：根据全国环境状况公报整理

3. 环保污染治理激发可持续发展战略

1992年之后，在企业生产力快速而无序释放所引致的社会影响中，环境污染所涉及的人群和空间范围最为广泛，使得中国处于一场环境污染危机之中，环保也因此成为社会关注的绝对焦点，并促发了社会舆论所推动的强化治理、综合治理和规模化治理。

一方面，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工业污染加剧，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频发。另一方面，中国的污染结构也发生变化，生活和消费水平提高所导致的城市生活污染加剧，例如，塑料包装物用量迅速增加，“白色污染”问题[1]突出。1999年，城市生活污水排放总量首次超过工业废水排放量。[2]

1 “白色污染“在中国主要指农膜及地膜导致的塑料污染环境现象。

2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我国城市污水处理能力有待提高”，载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027/2620816.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中国政府和社会进一步提升环境保护的战略地位，并从政策、法律和模式上提出了新的举措。值得一提的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环境治理开始由点源治理开始向规模化治理转变。

20世纪90年代长期“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特征的不可持续的生产模式，以及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快速引发了环境恶化，针对这一问题，中国工业污染治理开始实行

延伸阅读 5：“破坏环境和资源保护罪”进入刑法

1997 年，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增加了“破坏环境和资源保护罪”，实现了国家立法中有关环境犯罪规定的重大突破。[1]1998 年 7 月 17 日，山西省运城市人民法院就运城天马文化用纸厂特大环境污染案做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天马文化用纸厂法定代表人杨军武被判有期徒刑 2 年，并处罚金 5 万元。这是《刑法》修改实施后因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被判刑的第一案。[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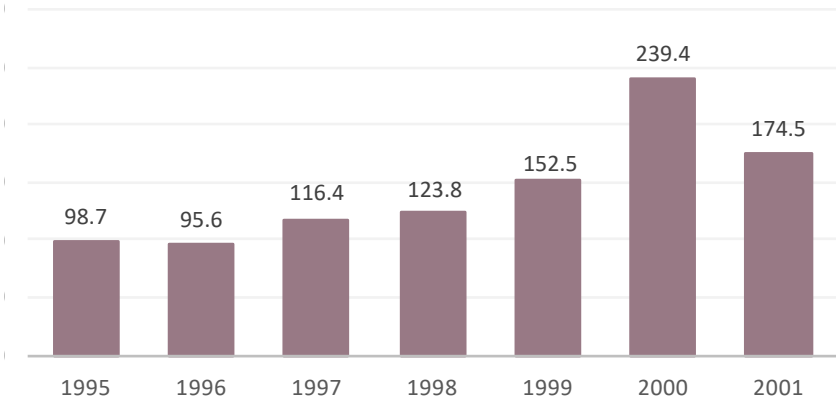


图3-19：1995-2001年中国工业污染治理项目当年完成投资（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根据全国环境统计公报整理

1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1997 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环境保护》1998 年第 7 期，第 3 页。

2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1998 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环境保护》1999 年第 7 期，第 3 页。

“三个转变”[1]。1992年，中国发布了《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首次在中国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1994年3月，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提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对策以及行动方案，并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于1989年提出的清洁生产的战略和推广计划列为重点项目之一，以降低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和废物。

此外，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国家先后制定和颁布了《海洋环境保护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环境保护法律。截至2001年，累积制定各类环境保护标准459项。“九五“期间（1996-2000），中国先后启动了“三河（淮河、海河、辽河）三湖（滇池、太湖、巢湖）一市（北京）一海（渤海）”等治理工程。这些措施作为整体，逐渐描画出中国解决企业的社会影响的治理路径蓝图，孕育着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雏形。

与此同时，中国还大幅度地增加了污染治理投资：1995年至2000年，中国总工业污染控制投资达到了3460亿人民币，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0.93%；其中2000年的总工业污染治理达到了1060.7亿人民币，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1%[2]。

三、全球价值链的整合与社会力量的再平衡（2002-2012）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此后十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化水平显著提升，也倒逼着中国企业提升劳工管理水平；与此同时，企业参与社会发展的热情提升，相关的污染问题也引发更多关注。

1. 跨国贸易倒逼本土企业责任

在入世之前，品牌采购商在中国选择供应商时已经提出社会责任审查的相关要求，以确认达到劳工、环保标准。入世之后，这种做法更成为一种普遍实践。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供应商端的制造成本。两个问题随之而来：第一，以廉价劳动力和资源密集为优势的中国制造是否会被社会责任的成本所扼杀？第二，社会责任是不是要把企业拽回计划经济时代？

此后数年，经过密集的讨论与研究，有关政府部门逐步形成共识。2006年，商务部副部长表示，“企业加强社会责任，这不仅是应对贸易摩擦，保证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出口稳

1 “三个转变”上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工业污染治理经历了“三个转变”，即从末端治理到全过程控制；从单纯浓度控制到浓度和总量控制的结合；以及从分散治理向分散和集中治理相结合。

2 张坤明：《当代中国的环境政策：形成、特点与评价》，《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 年第 2 期 第 1-7 页

延伸阅读6：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发展与争议

最迟在2006年，中国的政府部门和国家领导人首次正式且在积极意义上使用了“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此后，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观念在中国开始得到政、商、学界越来越普遍而正面的接纳。十余年来，中国中央政府各部门至少在十数个政策文件中述及企业社会责任及其重要性，各类企业的宣示和行动以及各类社会组织的研究和项目更不可胜数，这些都直接推动了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巨大发展。但与此同时，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就是，长期以来，在中国的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之间并不存在一个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与外延的共识，不同主体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驱动力、范畴以及具体行动方面存在着多种不一致甚至直接冲突的观念。

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至今都没有一个国家级的政策文件来界定企业社会责任，尤其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与其他相关重要概念（如法律责任、企业慈善）等的区别和联系。虽然中国有关部门也制定了关于社会责任的国家标准，但其不仅在很多方面修改了相应的国际标准，也与企业在国内外的实践相差甚远。另一方面，企业和社会组织在企业相关的各类问题上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泛标签化也使得企业和社会公众更加悬浮于企业责任的表象，而迷惑于企业责任的本质。这看似一种概念上的纠结与挑战，但对于企业及其利益相关方的影响却是直接而明显的。例如，至今，很多企业在谈到企业社会责任时将其单纯等同于公益慈善，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相对于识别和应对企业对利益相关方的影响而生的责任，公益慈善都是在行动上简单易行，而在传播上又事半功倍的捷径。

定型增长的需要，更是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内在要求”。[1] 政府的支持促进了社会责任被主流社会接纳。纺织服装、电子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先后编制了相关管理体系或指南，包括2005年5月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的CSC9000T管理体系以及2012年底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社会责任工作委员会发布的《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指南》。这些是中国的企业界系统性响应源自国际供应链上的责任要求的开端，也是中国的企业责任从被动应对向主动行动的分水岭。

2. 企业向善致力社会协调发展

这个时期，国际、国内市场的繁荣和整合使得企业在经济能力和社会意识上成长迅速，广大本土企业开始积累起巨量的盈余资金和技术能力，并受到促发，开始用之回报社会，使得中国企业成为推进中国社会事业快速发展的新兴力量。

1 廖晓淇：“敦促中国企业走出去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载新浪新闻网，<https://news.sina.com.cn/o/2006-02-22/13038274294s.s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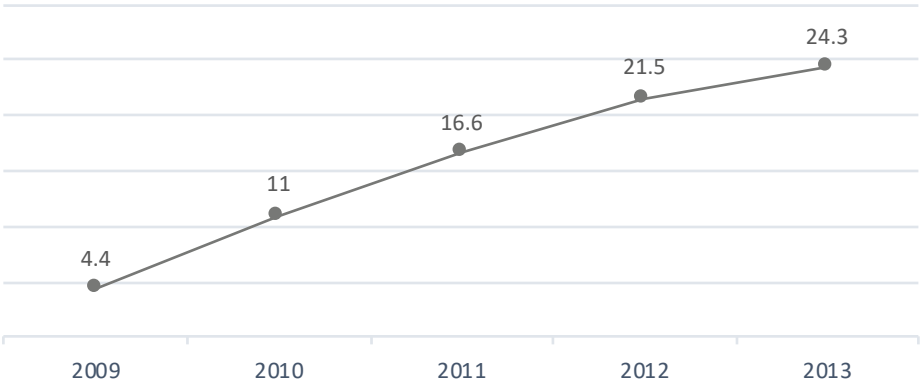


图 3-20：中国企业基金会公益事业支出（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基金会中心网

部分的中国企业在这个时期开始战略性地、系统性地参与，乃至发起各类社会发展项目和公益行动。例如，自2007年有全国性的捐赠统计以来，民营企业的捐赠数额一直都占据企业捐赠总量的一半以上。[1]一些实力较强且有战略视野和长期承诺的企业，开始寻求新的方式投身社会发展事业，如成立企业基金会。2012年，全国已有400家企业基金会，占全部基金会的14%。[2]

2008年汶川地震，是中国企业参与社会事业的标志性事件。此次事件中，中国社会捐款总额首次突破千亿元，是过去十年的总和。许多企业在经历了汶川地震的洗礼之后，开始重视和策略性地看待企业参与救灾及参与社区发展这一议题；越来越多地企业认识到，原来做生意“不仅要懂得怎么赚钱，也要懂得怎么花钱（回馈和融入社区）”。[3] 虽然2011年发生的郭美美事件[4]引发了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极大破坏了公益组织在公众包括企业心目中的信任度，但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一危机客观上促进并提升了公益领域的透明度及组织的风险管理意识，企业参与公益项目也开始变得更加审慎。

1 “2012 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发布，捐款总额连续两年下降”，载中国财经网，<http://finance.china.com.cn/roll/20130922/1826614.s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2 “《广东省基金会发展趋势分析·2012》报告显示：广东企业基金会数量全国领先，基金会从运作型向资助型转变”，载南方日报网，<http://epaper.southcn.com/nfdaily/html/2012-12/13/content_7150760.htm>（访问日期：2019年8月19日）。

3 郭沛源：“汶川十年 看企业救灾”，载21世纪经济报道网，<http://epaper.21jingji.com/html/2018-05/31/content_87239.htm>（访问日期：2019年8月19日）。

4 郭美美事件指名叫“郭美美”的一名女性在其身份实名认证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网络社交平台上炫富，从而引发了网络上对中国红十字会腐败的争议。尽管中国红十字会之后否认了与郭美美的直接关联，但这一事件仍然严重损害了中国慈善机构的整体声誉。

3. 环境挑战推动公众自发行动

2002年到2012年期间，公众环境意识不断增强且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诉诸集体自发行动反对环境污染。一些环境风险较高的项目遭遇“邻避运动”困境，典型案例包括2009年广州番禺垃圾焚烧项目，2012年四川钼铜项目及江苏启东污水排海工程等。

面对这些问题，政府进一步加强环境管理。2007年之后，环保总局力推环境经济新政，综合运用信贷、收费和补贴等手段影响企业行为。具体来说，在“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中国采取了四种主要的环境经济政策来防控污染[1]：

- **收费：**在此期间，中国政府采用了不同类型的污染处理收费，例如污水处理费以及废物收集和处理费。

- **税收：**2004年，中国国务院向各级政府机构发布了通知，特别是国家发改委（NDRC），财政部（MOF）和国家税务总局（STA），并鼓励发展诸如环境污染税之类的环境经济政策。

- **补贴：**2007年，中央政府设立了专项资金，用于中西部地区的污染减排项目，污水处理系统建设；此外，2009 年中国还启动了节能产品补贴计划。

- **阶梯水电定价：**2007 年，中国开始了一系列水电价格改革，例如降低燃煤电厂的电网上网价格，并对高污染行业收取更高的电价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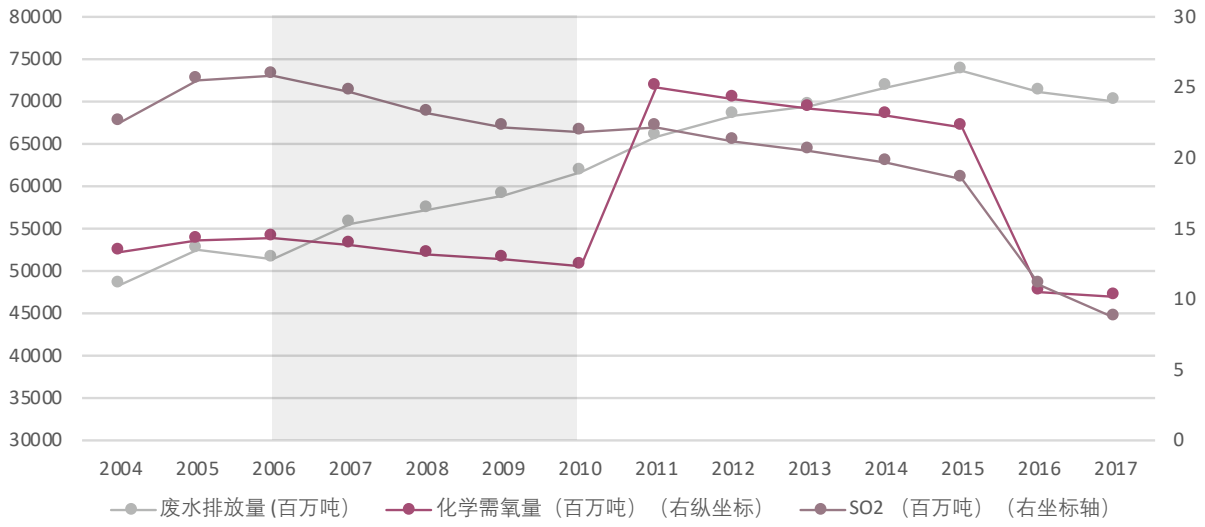


图3-21：中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2004-2017年（单位：百万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1 张立，尤瑜：《中国环境经济政策的演进过程与治理逻辑》，《华东经济管理》，2019 年第 33 卷第 7 期。

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由此萌芽，影响深远。其次，2008年环保总局升格为环境保护部，升格之后的环保部获得了更多的权力，资源和政治支持，可以更好地展开环境保护工作；此外，成为国务院下属机构可以使环保部：1）更能影响中央政府的决策，从而确保国家政策可以考虑环境问题；2）赋权地方一级的环境保护局，大大改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执行；3)升级为部委后的环境保护部还可以与农业部，林业部和水利部合作建立部际联席会议机制，以更好地整合资源并提高工作效率。

此外，中国政府开始考虑运用公众力量促进企业在环保领域的行动，包括推动环境领域面向公众的企业信息披露，包括在2006年推出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最后，2009年中国参加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明确提出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承诺，这一承诺倒逼国内的节能减排工作，并将压力逐步传导到企业端。

四、企业生态的新理念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2012 至今）

2012年，中国发展迈入新时代，展现出全新的发展理念。中国开始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此同时，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1]。这一时期，企业开始全面考虑其产品与经营活动对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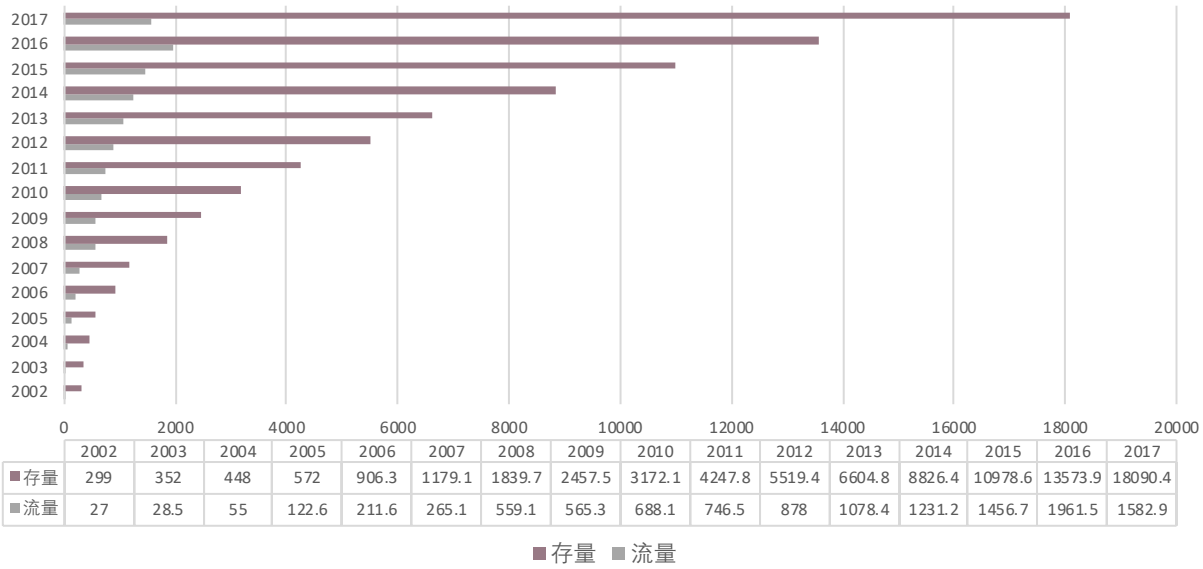
1. 开放新格局与中国企业的全球影响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在开启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同时有力促进了中国对外投资。例如，据统计，如果算上中国企业在第三地的融资再投资2，2014年中国的对外投资规模约为1400亿美元，超过利用外资约200亿美元。中国在当年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3]

1　于 2017 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2　第三地融资再投资指的是中国境内企业或居民通过在境外设立特殊目的企业（SPV）进行投境外投融资，从而实现享受第三地的优惠税收及外汇管理政策，更好地为境外运营融资。2005 年中国外汇管理局发布了相关政策文件，明确允许中国境内居民以特殊目的公司的形式设立境外融资平台。

3　李予阳：“2014 年内外贸成绩单亮眼：国内消费给力 对外投资发力”，载中国经济网，<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501/22/t20150122_4400732.s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存量	299	352	448	572	906.3	1179.1	1839.7	2457.5	3172.1	4247.8	5519.4	6604.8	8826.4	10978.6	13573.9	18090.4
流量	27	28.5	55	122.6	211.6	265.1	559.1	565.3	688.1	746.5	878	1078.4	1231.2	1456.7	1961.5	1582.9

图 3-22：中国建立《对外投资统计制度》以来各年份的统计结果（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2017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注：2002-2005 年数据为中国非金融类对外投资数据，2006-2017 年为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

中国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在发展当地经济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环境与社会影响，譬如生态破坏、移民搬迁等。2017年调查显示，中国企业认为劳工问题（47.64%），环境保护问题（47.64%）及社区问题（43.22%）给他们的海外运营带来了较高或非常高的影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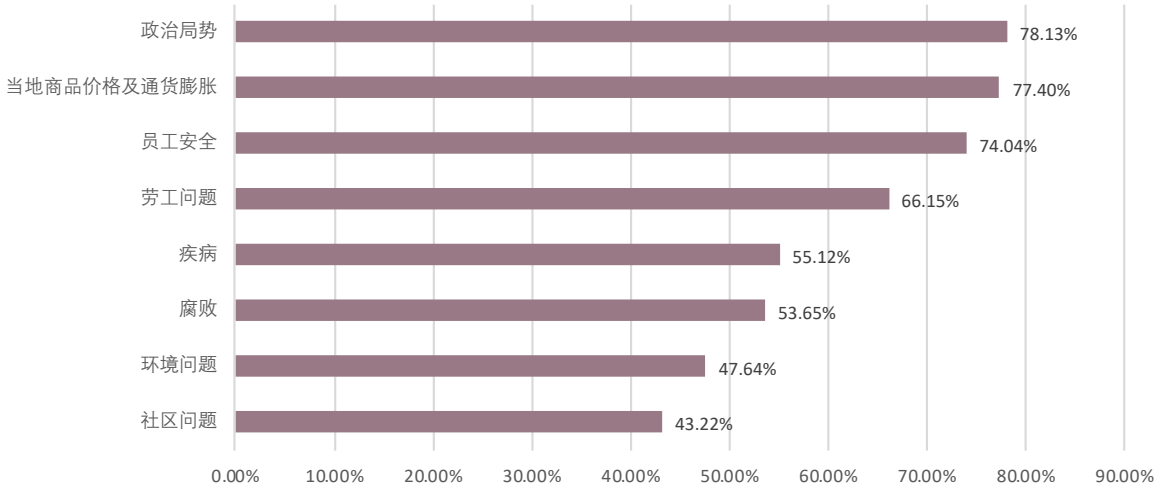


图 3-23：中国海外运营企业主要面临的挑战

数据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2017年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报告》，2017年

注：2017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面向543家中国在海外运营企业进行问卷调查；有效问卷共490分，针对基于不同的挑战风险重要程度评分，其中“1”为最不重要，“5为”最重要。上图显示的是评分大于或等于3的受访企业比例。

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及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2017 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报告》，2017 年 9 月。

政府部门开始重视这一问题。国家发改委颁布的《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都指出要履行社会责任、注重环境保护、树立良好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时期，在诸如全球气候治理、负责任矿业供应链等个别议题上，中国政府和社会组织已经开始担当领先者或领导者的角色，也开始承担起更加重大的责任。

案例一：格力电器参与国际空调标准制定

标准是商品质量的保障和经济活动的技术依据。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是一国制造业实力的表现，也是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表现。在参与国际标准化方面，ISO的160多个成员国中，少数发达国家制定的国际标准占了标准总数的95%。中国虽然是ISO六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制定的标准数量却仅占总数的0.7%，我国提交ISO、IEC并正式发布的国际标准占比仅为1.58%，这与我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的地位不相称1。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企业“走出去”，部分企业开始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企业直接参与国际标准的起草工作，将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果纳入国际标准，实现企业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国际化，可有效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作为中国制造最先“出海”的企业之一，格力电器已累计主导和参与了近300份国际、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工作，通过先进的标准促进技术水平提升，引领行业健康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格力参与环保冷媒、光伏空调、空调能效等多个国际标准制/修订，在“标准走出去，产品走出去”的发展道路上起到了良好的引领示范作用2。

2018年1月，格力电器与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世贸中心举行签约仪式，该项目将全部使用格力自主研发的光伏空调。凤凰世贸中心整个项目采用的空调设备总量超过1200台，光伏板装机容量超过6.7兆瓦，项目总冷量超过4200冷吨，是目前全美乃至全球最大的光伏空调项目。作为中国制造业的领军企业，这一大订单既是格力电器在光伏空调领域的一大步，也给中国制造“走出去”增添了更多的信心与力量。在签约这个项目之前的2017年11月，格力已经参与到美国和加拿大空调国家标准的制定工作。因此，虽然格力多联机进入美国市场只有两年多时间，但由于高度契合美国光伏市场的需求或者说是标准，才最终使得格力迅速进入美国市场。

任何一家企业若想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并将自己和所代表国家的创新实践写入标准，背后需要扎实的知识产权、自主技术作为支撑。这方面，作为中国制造业的领军企业，格力电器凭借19项“国际领先”成果和多项国际首创的核心技术，具有了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能力。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0月30日，格力累计申请专利32850项，获得授权专利19346项。在国际上，2015年，格力光伏直驱变频离心机组获得英国RAC制冷行业大奖(RAC

1 董明珠：关于进一步支持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建议 http://www.stdaily.com/zhuanti01/zndw/2018-03/15/content_647730.shtml

2 参与多项标准制定 格力在国际舞台发出“中国声音”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xinhuanet.com/tech/2018-08/17/c_1123285537.htm

Cooling Industry Awards)——年度国际成就大奖，这是中国企业首次获此殊荣。同年，英国暖通空调行业又一颁奖典礼——HVR颁奖礼在英国伦敦举行。格力光伏直驱变频离心机获得HVR年度商用空调产品大奖；2017年初，格力光伏直流变频直驱多联机获UL产品认证机构颁发的全球首张光伏多联机证书。

2. 商界参与扶贫与互联网社会的新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整体经济实力和社会发展水平都有了极大提升，但在一些偏远地区，贫困人口的数量仍然较大。为改变这一局面，政府提出了“精准扶贫”的策略，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1]2015年和2018年，政府先后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而且这些政策文件十分重视企业与市场在精准扶贫中发挥的作用。中国逐步形成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结合的大扶贫格局，脱贫攻坚取得了显著成效。根据中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统计，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8年底的1660万人，累计减少8239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8年底的1.7%。[2]

在政策引导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采取产业扶贫、金融扶贫、技术扶贫等“授人以渔”方式参与精准扶贫，在改善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同时，也为企业自身发展开拓了新的市场空间，逐步形成了“双赢”或“多赢”的共享发展模式。总体来看，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主要有四种途径，包括为贫困地区提供生产要素、帮助贫困地区培育产业集群、开发潜在市场需求，以及发挥自身产业链优势塑造良好的扶贫环境。

1 中国国务院：《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2014年，载国务院网站 http://www.english.gov.cn （访问日期：2018年10月4日）。

2 石长毅：“2018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1386万人”，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官网，<http://www.cpad.gov.cn/art/2019/2/15/art_624_93981.html>（访问日期：2019年8月1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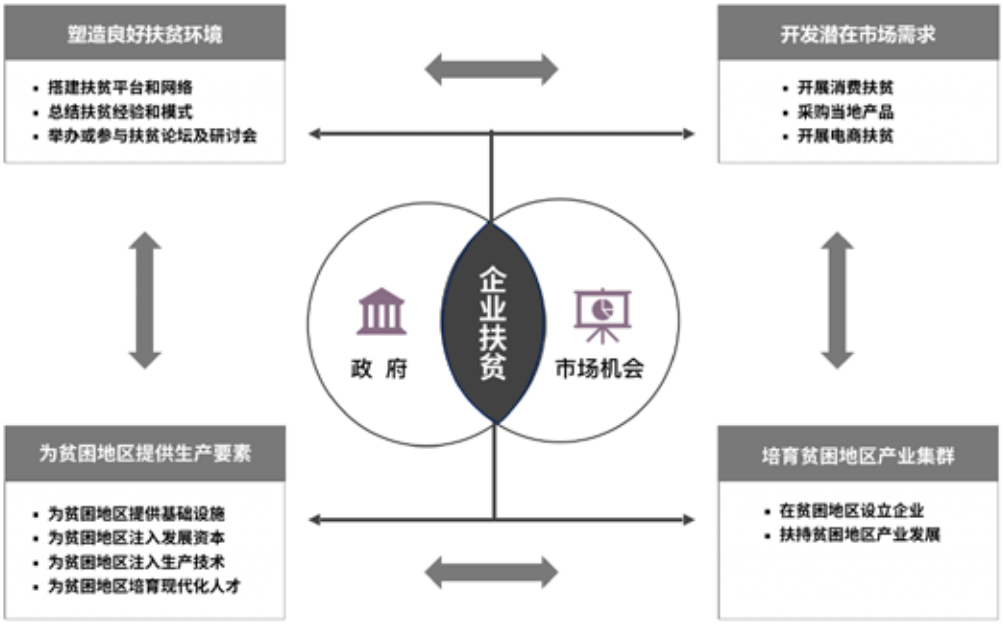


图 3-24：中国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四种途径

案例二：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以碧桂园产业创新扶贫模式为例

碧桂园很好地说明了企业和市场在减贫事业中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响应相关政策号召，碧桂园制定了《碧桂园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工作指引》等一系列文件，先后与多个地方政府签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项目在当地的落地实施。

- **技术创新造福农村发展**

实现农村的全面振兴离不开技术创新，但同时农村又普遍缺乏创新研发所需要的人才、资源及资金支持，因此企业引入合适的技术将有效推动农业现代化及农村的长久发展。在继续地产主业的同时，碧桂园还进军了机器人产业、现代农业、新零售等产业，并根据农村当地的具体情况，推动现代农业、机器人产业、新零售、绿色建筑产业等项目进驻贫困地区。比如碧桂园智能建造产业基地落户江西兴国县，整体投产后，首批带动300多名贫困户就业，预计年纳税约4000万元；博翰居新型建材产业基地开工建设落地新河县，将建设全自动墙板生产线，并安置帮扶县人员就业。联动下属农业公司，在贫困地区规划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引导和扶持贫困村创办合作社，已在广东英德、江西兴国、陕西耀州和蓝田落地了无土蔬菜栽培、富硒水稻项目、贝贝南瓜等项目。

- **“农业+互联网”，促进城乡融合**

碧桂园还依托新农业和互联网等信息平台，促进城乡的同步发展。碧桂园通过联动集

团零售品牌凤凰优选，发挥企业市场开拓能力和渠道、信息优势，通过收购代销、加工等形式，助力解决优质农产品的销售难题。凤凰优选在全国9省14县启动开店计划，在贫困县和周边布局分店，设立扶贫产品专柜，并吸收当地贫困户上岗就业。截至2018年底，凤凰优选已在835家门店设立了扶贫专柜，引进扶贫产品955款，通过带动就业惠及1,678名贫困户。此外，碧桂园创立扶贫自有品牌“碧乡”，通过电商、展会等线上线下渠道，将60多种优质农产品从田间引向市场。

- **发起社会扶贫共同体**

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仅仅依靠传统的扶贫平台是不够的，必须在实践中探索可持续的扶贫机制，科学谋划、整合资源、精细管理，努力实现贫困户、政府、社会和企业的多方共赢。碧桂园集团、国强公益基金会联合各界社会力量共同发起“社会扶贫共同体”，汇聚70多家企事业单位、媒体、公益组织和个人代表的社会资源，有效对接贫困村、贫困户的“脱贫需求”，共同参与精准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经过近几年的积极参与，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在精准扶贫方面均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创新了企业扶贫的形式。

以中央企业为例，2016年10月，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财政部和国务院扶贫办参与发起，51家中央企业参与首期出资，设立了央企扶贫基金，首期出资额122.03亿元。截至2019年上半年，央企扶贫基金股东达到104家，两期募资规模累计达到154亿元。截至2019年2月，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基金（2014年由财政部、中央企业、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共同发起）和央企扶贫基金共完成103个项目的投资决策，金额达151.5亿元。通过直接投资、在重点省份设立子基金、发起扶贫基金联盟等方式，引领撬动社会资本超1700亿元投入贫困地区，已投资项目完全投产后，将带动48万贫困人口就业[1]。

2015年，在全国工商联的组织下，民营企业发起了“万企帮万村[2]”精准扶贫行动，逐渐形成了产业扶贫、商贸扶贫、就业扶贫、电商扶贫和其他扶贫方式并举的精准扶贫模式。据统计，截至2018年底，共有7.64万家民营企业参与其中，帮扶8.51万个村，产业投入712.46亿元，公益投入127.74亿元，安置就业67.97万人，技能培训84.60万人，惠及970余万贫困人口[3]。

1 中国扶贫：“基金行业服务脱贫攻坚座谈会在国投召开”，载网易新闻，<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EBPB9LTJ0514BL38.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2 指以民营企业为帮扶方，以建档立卡的贫困村为帮扶对象，以签约结对、村企共建为主要形式，力争用 3 到 5 年时间，全国一万家以上民营企业参与，帮助一万个以上贫困村加快脱贫进程。

3 “万企帮万村”惠及近千万贫困人口“，载中国统一战线新闻网，<http://tyzx.people.cn/n1/2019/0419/c372194-31038409.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案例三：中国平安村医项目助力人本发展

在中国，医疗一直是关系民生最急迫的问题。然而，中国的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匀，在边远贫困地区，看病难、看病贵导致很多原本并不富裕的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近年来，偏远山区落后的医疗水平与村民不够健全的健康意识使得村民疾病发病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提升乡村医生医疗服务水平，加强贫困地区医疗服务能力建设刻不容缓。

2018年1月，中国平安正式启动总公益投入为100亿元的“三村建设工程”，面向“村官、村医、村教”三个方向，实施产业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村医项目”作为平安集团“三村工程”项目之一，将面向全国贫困地区实施健康扶贫，针对贫困地区设备水平落后，村医知识水平不足，村民健康意识薄弱的现状，在2018年至2020年期间，为贫困地区升级1000个乡村诊所、培训10000名村医。具体而言，村医项目计划在全国开展“4+1”智慧医疗综合行动，全面启动“村卫升级”“村医培训”“辅助诊疗”“健康体检”四大医疗服务升级行动，以及为村民建立“健康管理档案”的专项行动，面向村卫、村医、村民三个层面，实施立体化的健康扶贫工程，切实改善贫困地区基础医疗服务水平。

- **面向村卫：打通医疗的“最后一公里”**

平安向乡村诊所捐赠检测一体机医疗设备，改善贫困地区村卫的硬件设备，为村民提供一站式常规检测服务。同时，依托平安研发的“好医生村医版APP” AI 智能辅助诊疗系统，帮助村医提升初诊准确率，并通过线上挂号及集成数据功能，大幅提高转诊效率。此外，针对村民缺乏健康信息管理问题，平安通过检测一体机为每名村民建立专属健康档案，档案信息同步于“好医生村医版 APP”平台，实现信息化的“智慧村卫”升级。

- **面向村医：培养“平安好医生”**

平安创新运用互联网平台整合资源，解决村医知识水平不足、培训渠道少、组织困难等问题。平安好医生村医版 APP 聚合全国名医，与村医“一对一”结对，在线协村医助解决疑难问题，辅助村医日常诊疗，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实现村医智慧升级。此外平安联合各地政府及中国志愿医师协会，邀请具有长期基层医疗单位工作经验的医生，为乡村医师组织集中培训，讲解基础体检检测报告、当地常见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治等课程，提升广大村医和基层医务工作者专业技能。

● **面向村民：大数据助力义诊**

平安重点针对贫困地区村民健康意识不足的问题，购置专用移动检测车，组织名医专家，在贫困一线开展村民体检义诊活动。平安运用创新云端数据平台，实时上传村民体检报告，实现线上线下现场同步解读，第一时间为村民和卫生部门提供健康风险警示，帮助村民早发现、早治疗，降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风险。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村医工程”累计升级村卫400 所，培训村医5702 人，开展移动健康检测109 场，体检覆盖12831 人，义诊覆盖6440 人。

一方面，从1994年到2018年，伴随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中国互联网产业取得了飞速进步。2008年，中国网民数量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互联网大国；2018年，全球互联网用户达到了38亿人，中国占全球互联网用户的21%，印度占12%，美国占8% 。另一方面，中国互联网企业快速成长。在市值最高的全球30大互联网公司中，美国占据18家，中国占据7家 。随着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壮大，以及其对中国经济社会影响的加深，政府、社会及消费者对互联网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期望越来越高。

互联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2015年7月，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将“互联网+”作为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产业化的加速，一方面，涌现出一批以网络信息技术为基础经营的企业；另一方面，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持续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实体经济，形成一批行业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健康、养老、教育、旅游和社会保障等新兴服务不断涌现；“互联网+政务服务”已经成为创新政府服务模式、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工具。

- **在城市，“互联网+政务服务”得到进一步深化。**各级政府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通过技术创新和流程优化，增强综合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统计，截至2018年12月，微信城市服务累计用户数达5.7亿个；微信城市服务中生活缴费类服务累计用户达4684万。[1]

- **在农村，互联网被寄予填补“城乡鸿沟”、助力农村发展的期待。**截至2018年底，中国农村网民规模为2.22亿，占整体网民的26.7%[2]。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农村网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4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902/P020190318523029756345.pdf>（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2　见上注 1，第 4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络零售交易额达1.37万亿元。[1]

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新的社会议题，如消费者隐私保护、青少年网民保护等问题。如在抑制网络游戏负面影响方面，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络游戏用户规模达4.84亿，占整体网民的58.4%；手机网络游戏用户规模达4.59亿。[2]近年来，中国发生了多起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社会事件。为加强对网络游戏市场的监管，2017年12月底，中宣部联合广电总局等8个相关部门发布了《关于严格规范网络游戏市场管理的意见》，针对网络游戏违法违规行为和不良内容进行集中整治，网络游戏企业也开始重视“防沉迷”机制建设。

3. 绿色转型与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

虽然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在这一时期依然严峻，但这一领域的攻坚和破局也在这个时期真正开始，其总体策略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是本行政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考核结果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奖惩和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3]。”2015年实施的修订版《环境保护法》推出了更为严苛的环境处罚措施，包括按日连续处罚、查封扣押、停产限产、移送司法机关等，还允许有资质的公益组织发起公益诉讼。新法执行的力度、遵守的程度、产生的影响前所未有。[4] 2016年，查封扣押案件近万，同比增长138%；停产限产案件五千多件，同比增长83%（见下表）[5]。这说明，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显著增加了企业违规成本，对污染企业来说具有较大的威慑力。

表 3-1: 2015 与 2016 两年《环境保护法》新处罚措施实施统计

年份	2015	2016	同比增长
查封、扣押措施（件）	4192	9976	138%
按日连续处罚（件）	716	1017	42%

1 “商务部：2018年农村网络零售额1.37万亿元”，载央视网，<http://news.cctv.com/2019/02/22/ARTIGepl7CqYCda8VEsxUK82190222.shtml>（访问日期：2019年8月19日）。

2 见上页注1，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访问日期：2019年8月19日。

3 “习近平出席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网，<http://www.gov.cn/xinwen/2018-05/19/content_5292116.htm>（访问日期：2019年8月19日）。

4 杨梦晴：“新环保法效果评估：信息公开仍不理想”，载南方周末官网，<http://www.infzm.com/content/124280>（访问日期：2019年8月19日）。

5 新《环境保护法》实施效果评估课题组：“新《环境保护法》实施效果评估报告”，载人民网，<http://legal.people.com.cn/n1/2016/0526/c42510-28380348.html>（访问日期：2019年8月19日）。

按日连续处罚金额(亿)	5.69	8.14	43.12%
停产限产(件)	3100	5673	83%
移送行政拘留(件)	2079	4041	94.37%
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件)	1685	2023	20.06%

信息来源:同上页脚注 5

此外,在这个阶段,中国在环境治理领域一个值得关注的举措转型就是在传统的强化法制监管之外,引入强制性的社会参与。例如,2018 年 7 月 16 日生态环境部公布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听取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1] 也即,将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及表达权作为环境治理的新动力和新权威。

延伸阅读7:中国环境披露信息应用的四个阶段 [2]

公共环境数据(Publicly Available Environmental Data,简称PAED)的巨大潜力正受到全球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的重视。过去二十年间,中国持续地进行公共环境数据运用的探索。如果做一个归纳总结,公共环境数据的运用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 **第一个阶段:**公共环境数据是缺失的。20世纪90年代,中国逐步建立各项环境管理制度;然而,政府各个部门收集到的有限的数据资源分散在不同的部门手中。

- **第二个阶段:**政府部门及非营利组织等机构与公众等其他机构共享部分或全部公共环境数据,以原始数据为主。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环保总局下发《关于共享企业环保信息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环保总局向人民银行提供"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形成的企业环境违法活动信息。待条件成熟后,将各级环保部门日常环保执法信息逐步纳入企业征信系统。此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2008年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进一步要求排污超标的企业向公众提供环境管理和污染排放的信息。值得一提的是,民间环保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也在这一时期(2006年)建立。IPE于208年发布了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指数体系;截至2018年,IPE已对全国113个城市的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状况进行评价。

1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官网,<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2/201808/t20180803_629536.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2 本文《公共环境在绿色金融中的运用》原载于《中国金融信息网》,由原作者郭沛源授权修改收录。

- **第三个阶段：**也就是近来几年，政府部门，非营利组织等机构共享公共环境数据，并且以一种对金融机构来说简单明了、用户友好的方式进行结构化的呈现。环保部门的环境数据共享在这之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也同样面临不少挑战。主要表现在：共享信息主要是企业违规信息，通俗地说就是黑名单，但这些信息往往缺乏程度的描述；共享信息全是负面信息，缺乏正面信息，可以帮助剔除差的企业，却不能帮助甄别好的企业；有时候，公众获取信息之后，缺乏专业知识读取、理解和运用这些信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近几年，一些省地市的环保部门开始探索新的做法，用更简单明了的方式结构化呈现这些公共环境信息。如，江苏省环保厅设计了一套企业环境信用评价机制，用绿、蓝、黄、红、黑五种颜色来予以区分。

- **第四个阶段：**也就是未来的趋势是：公共环境数据为大众所用，最大程度得发挥其公共价值。从共享原始数据到结构化呈现，公共环境数据的使用成本下降、使用需求提升，公共环境数据在公众生活中的运用得以极大加强。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个部委共同发布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强制要求所有上市企业在2020年之前公布自己的环境信息。

案例四：广东长隆集团探索保护野生动物新机制

野生动物和植物是最珍稀的自然资源。然而，随着气候变化、自然灾害、栖息地破坏、外来物种入侵等问题，全球有相当一部分野生动植物正处在濒临灭绝的危险境地，野生动植物保护面临着严重挑战。因此，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第14和第15个目标分别对水下生物和陆地生物的保护提出了具体目标要求。

中国国土面积广阔，境内野生动植物种类和类型丰富多样。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野生动物栖息地正逐渐破碎或丧失，环境污染给生态系统带来了严重破坏。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迫切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行动起来，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18修正)》也提出“国家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通过捐赠、资助、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野生动物保护活动，支持野生动物保护公益事业。”

广东长隆集团创立于1989年，公司在1997年成立了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目前拥有广州长隆旅游度假区和珠海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两大世界顶尖综合旅游度假区。长隆集团饲养管理着来自全球的500多种、20,000多只野生动物，在世界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引进、繁育、保护和科普教育事业上取得了一定成绩。

- **成立动植物保护基金会**

2017年，长隆集团发起成立了专门从事动植物保护的非公募基金会——广东省长隆动植物保护基金会。长隆集团决定，自2017年3月1日起，公司属下的长隆海洋王国、长隆野

生动物世界、长隆飞鸟乐园、长隆欢乐世界、长隆水上乐园、长隆国际大马戏、长隆横琴国际马戏城每购一张门票(按购票人数计算)捐赠人民币1元到本基金会，作为该基金会的后续基金，捐赠期限暂定3年。长隆动植物保护基金会成立一年以来，积极参与了2017年全国“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月”、“候鸟护飞”行动等公益宣传活动，并资助了“守护微笑精灵—江豚”等濒危动物的保护项目。

- **普及野生动植物保护理念**

为提高青少年动物保护认知，长隆集团设立了“长隆动物学院”专项，以科普进校园、科普进社区、科普童书、度假区内科普等方式，不断普及动物保护理念，让更多人加入到环境保护、动物保护行动中来。为保护虎豹等大型猫科动物，2018年3月1日，广东长隆集团和广东省长隆动植物保护基金会承办了以“保护虎豹，你我同行”为主题的全国2018年“世界野生动植物日”主题宣传活动，来自中国外交部、公安部等22个部门代表，美国、法国、津巴布韦等9个国家驻广州领事馆的代表，以及世界自然基金会（WWF）、野生救援等国际组织的代表，中国湿地保护协会、阿拉善SEE基金会等国内组织代表，以及野生动植物保护青年志愿者、游客等千余人参与了此次活动。

- **开展专项合作**

长隆集团依托基金会，与许多国际、中国的野生动植物保护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如为保护水生野生动物，2017年7月19日，长隆集团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分会签订了《中国水生野生动物保种、繁育及科普宣传项目合作协议》，共同开展我国珍稀特有水生生物保护、繁育及科普宣传工作。

案例五：宁波半边山生态旅游景区

作为一家国有企业，半边山投资有限公司按照宁波低碳生态城市建设的部署，从成立伊始即围绕“带动地方经济转型升级发展，与驻地互惠共荣，与环境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企业入驻以来，积极带动驻地转型升级发展，实现产业升级、收入升级、生态环境升级。

- **带动驻地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发展**

半边山度假区在建设之前是个渔村，居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本地打渔、外出打工，因此，收入普遍较低，绝大部分在3000元/月以下，尚处于城镇化的初、中级阶段。宁波半边山投资有限公司投入开发后，带领半边山进入了以“绿色化”为主线的“就地城镇化”路径。

该公司以生态旅游业带动半边山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本地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移。十几年来，公司为本地27%的人口提供了53个培训就业岗位。与此同时，半边山还通过创造大量本地就业岗位，有效减缓了本地劳动力流失等社会问题，推动了当地的城镇化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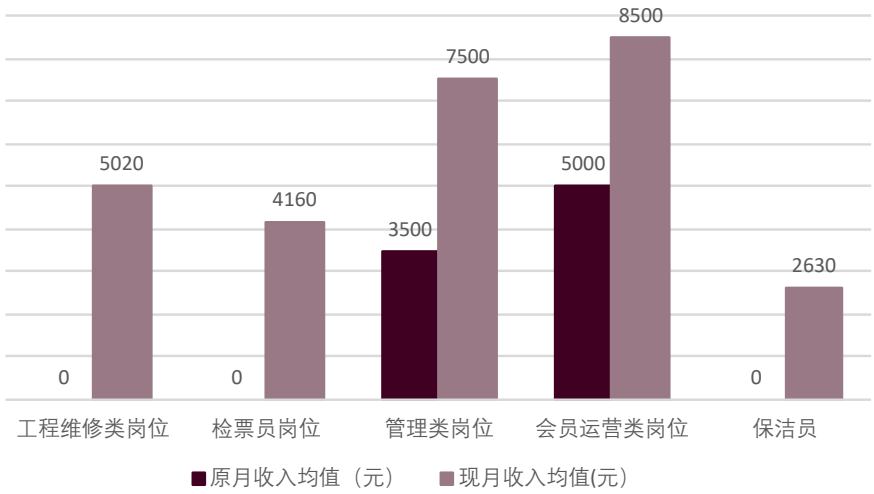


图 3-25：半边山景区吸纳的本地劳动力月收入均值的前后变化（前五类）

- **落实生态旅游，保护地方环境**

半边山还最大程度地确保了当地的原生态优势的生态资源不受到影响，并专门对本地的生态环境进行了改造提升。半边山以绿色建筑为切入点，建设开发低碳绿色景区，因地制宜地进行绿色屋顶建设，构筑绿色建筑群，如空中花园、空中菜园，绿色内外墙等，不但有效缓解了热岛效应，还形成了半边山度假区的微循环。

“绿色饭店”经营模式也是该景区的一大特色。景区内的宁波象山海景皇冠假日酒店倡导游客绿色消费，通过各类奖励性质的措施，最大可能地减少一次性产品的使用；同时，该酒店在不降低服务品质标准的前提下，尽可能循环使用各类资源，如利用残余食物进行厌氧发酵，从而提供沼气能源等。此外，酒店还经常举办各类活动，充分利用媒体发布会、宣传专栏等多种形式，进行绿色消费理念的相关宣传。目前该酒店正以其突出的绿色表现申请国际LEED绿色建筑认证。[1]

- **支持当地社区及本地文化发展**

景区内的半边山东海学堂每年开展传统文化夏令营活动，针对城市青少年对大自然及农村地区的隔阂和疏离感，将当地传统文化等理念的教育与农学农艺的实践活动相结合，同时在青少年中推广普及绿色发展意识。

1 LEED（绿色建筑认证）项目是全球范围内的主流绿色体系，简述评级认证美国民间绿色建筑认证奖项，由非盈利组织美国绿色建筑协会（USGBC）运作。LEED 包括了一套用于建筑物的设计，建造，运营和维护的评估系统，旨在帮助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环境和住户的负面影响，并最大程度地提高能源和资源效率。

社会参与的另一个典型举措是绿色金融[1]的迅猛发展。2015年9月，中央颁布《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建立绿色金融体系”。2016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形成中国绿色金融基础框架。此后，绿色金融的发展明显加速。目前，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融资余额总计近 9 万亿元、绿色债券存量规模超过5千亿元。[2]绿色金融通过融资成本、风险管理成本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对企业造成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将降低绿色企业融资成本、提高污染企业融资成本，从而撬动企业加速绿色转型[3]。

1 绿色金融此处指将环境评估纳入信用评估流程的所有融资活动；此外，信用评估过程还将侧重考核于保护生态环境和绿色产业的发展。

2 鲁政委，汤维祺：“兴业研究：2017 年中国绿色金融市场综览”，载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官网，<http://www.greenfinance.org.cn/displaynews.php?id=1880>（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3 欲了解更多关于绿色和社会债券市场的概况，请访问：https://pressroom.credit-agricole.com/news/green-and-social-bonds-market-overview-a-strong-continued-momentum-b842-94727.html#lw9DDHdVHhqu30PU.99。

第四章

4

第四章
中国社会主要利益相关方对企业生态的作用

利益相关方是企业生态的塑造者和参与者，决定企业运营的社会环境，根据社会发展不同时期的不同需求，针对企业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做出不同的反应。改革开放40年中，中国企业的利益相关方的构成、其自身发展和对企业的要求经历了较为复杂的变化。总体来看，影响企业的利益相关方的构成经历了从相对单一到多元化，关注点从单一领域逐渐拓展到企业对社会和环境的综合影响，而各个利益相关方与企业的互动也经历了从监督和压力模式到与企业合作解决社会问题的合作伙伴模式的转变。具体来看，改革开放40年间对企业的经营行为和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利益相关方大致可以分为四类：政府部门、国际机构、行业组织和社会组织。

一、政府部门

政府在企业生态环境塑造上，具有引导性地位，起到规制和推动的作用。而在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政府和企业关系的变化最为显著。

1. 推动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

只有成为独立法人实体，具有经营权，企业才能对自身经营行为的影响负责。1978年之前，中国没有真正的“企业”概念，生产单位从原材料、员工、产品生产计划到销售都是

完全按照政府要求，根据国家计划进行生产、销售。1978年改革开放后，企业逐步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和利益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府逐渐由完全的管理者身份，转换为通过制定政策引导和服务企业发展的角色，塑造符合国家意志和社会发展需求的企业生态。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该决定特别指明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改革思路，提出企业应有的多项自主权，应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1]

此后，中国的公司制度逐渐开始恢复，有关公司立法也逐步推进。1994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公司法》，明确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是企业法人”，[2]企业依法经营、自负盈亏。

这样，依据改革政策和法律规定，企业法人成为市场经济中的独立实体，改变了以往政企不分，企业缺乏独立经营权的局面，形成了企业和政府的新型关系。这些与企业经营行为规范相关的法律法规集中在劳动者权益保护（核心法律包括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200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及200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消费者权益保护（主要是1994年1月生效并于2013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境保护（主要是以1989年正式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核心的百余项法律法规）以及公益慈善领域（主要是199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和201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2. 倡导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进入第二个十年以来，在利用政策法规强化监管约束之外，中国政府也开始注重利用政策措施促使中国企业关注和解决其社会与环境影响。特别是2006年以来，政府逐步成为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力量。

第一，在法律法规和政策层面确立并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在2006年之前，中国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更多是为企业的生产和运营建立各种基础规则，虽然一系列关注环保、消费者和劳动者的法律在此之前已经出台，但可持续发展或者企业的社会责任并没有上升为法律原则或法规主题。

1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载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chinese/archive/131659.htm>（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2 199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修正），第 3 条第 1 款。

2006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案以法律形式明确要求公司要承担社会责任，这既是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强制性要求，也是政府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根本依据，还是带动全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形成共识的基础此后，中国政府各有关部委以及诸多地方政府开始推出专门的法规或部门政策文件，引导和监督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1）**国资委：**2008年，国务院国资委以制定印发《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为起点，通过开展理论研究、发布政策文件、制定发展战略、开展管理提升、加强信息披露、开展国际交流等一系列措施与活动为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营造了良好的氛围。10年以来，“中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和实践在‘质’与‘量’上都实现了大跨越，成为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标杆与典范”。[1]

图 4-1：国资委推进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路线图 [2]

（2）**商务部：**商务部是较早在中国关注和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并最早出台有关政策的部委之一。2008年，商务部发布《外资投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指导性意见》，从保障权益、提升企业诚信、保护环境、构建社会和谐等几个基本方面引导在华外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近年来，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发布有关中国“走出去”企业环境保护指南、员工管理指引、境外文化建设等政策和要求。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推动下，商务部还通过《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引导中国企业遵守投资目的地法律法规、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履行社会责任。

1 “央企担当，国家力量：中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官网，<http://www.sasac.gov.cn/n2588025/n2588134/c8549345/content.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2 王秋蓉：“推动央企社会责任工作谱写新篇章”，《WTO 经济导刊》2018 年第 9 期，第 16 页。

（3）生态环境部（原环保部）：2008年，生态环境部发布《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强制企业公开环境信息，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环境信息的权益，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2010年，出台《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指导企业加强环境信息披露。同时，生态环境部陆续发布政策和法规来约束企业严格遵守法律，规范经营行为，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4）其他部委：2012年，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认证机构履行社会责任指导意见》，就建立健全认证机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进行了制度性安排，鼓励认证机构从2012年起公开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一直致力于推进社会责任标准化建设，2015年发布了包括《社会责任指南》在内的社会责任系列国家标准；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鼓励企业绿色发展，在推动企业节能减排，助力企业可持续发展方面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也发布了政策规范以引导银行业和保险业的社会责任建设和绿色金融的发展；科技部积极推进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和示范区建设，于2017年印发《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申报指引》，并在同年与联合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与联合国科技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谅解备忘录》，积极分享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经验，提升科技促进可持续发展能力。

（5）地方政府：在国务院、中央政府部门的指导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通过制定政策、指引、标准、评估办法等方法，促进区域内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升区域责任竞争力水平。据统计，从2004年常州市总工会联合有关单位制定出台《常州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起，至少有14个各级地方政府发布了46项推进区域内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地方政策文件，其中有代表性的包括2007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见》、浦东新区多部门联合发布的《浦东新区企业社会责任导则》以及2008年山东省烟台市发布的《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社会责任考核评价体系实施意见（试行）》等。

第二，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倡导。在不断完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各类政策性文件和政治场合倡导可持续发展和企业的社会责任。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中国政府向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与发展报告》，在系统回顾中国环境与发展的过程与状况的同时，阐述了中国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立场和观点。2003年，中国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倡导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强调企业要在生产过程中关注人和环境价值，

这与企业社会责任所追求的目标不谋而合。

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增强包括企业在内的公民和各种组织的社会责任，参与和谐社会构建。此后，中国的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表达了殷切期望。2008年11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演讲时指出，“企业是在社会中存在和经营的，也必须考虑自身行为的社会效益和社会影响”，他要求企业要树立责任理念，“自觉将社会责任纳入经营战略”。他同时提出，“各国政府要加强引导和监督……为企业自主履行社会责任创造良好环境。”[1]

进入新时代，中国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的政治倡导也踏上了新高度。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强化大企业社会责任”；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履行社会责任”纳入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六大重点工作之一；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立法”。2017年的十九大重申、强化并提升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要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新一届国家领导人也对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屡屡表达了强烈的期望。2013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南非同非洲国家领导人会面中提出，中国政府将继续要求中国在非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2016年4月，习近平在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企业做得越大，社会责任、道德责任就越大……只有富有爱心的财富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财富，只有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才是最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企业。”2018年10月，习近平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一带一路”建设“要规范企业投资经营行为，合法合规经营，注意保护环境，履行社会责任”。

第三，积极推动、深度参与和努力丰富国际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多、双边合作。2010年9月，中国对ISO 26000《社会责任指南》国际标准最终草案稿投出了赞成票。2011年6月，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与其他国家一起通过了《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中国自2013年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先后载入多个联合国决议和文件，丰富了国际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指导观念。2015年，除了为通过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作出历史性贡献之外，中国还在联合国支持通过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自此之后，中国政府不仅是其他许多重要的国际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推动者和参与

1 “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载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2-09/08/c_113005563.htm>（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表 4-1: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行动

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行动	
2016 年 4 月	中国发布《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
2016 年 7 月	中国就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情况在联合国高级别政治论坛上进行国别自愿陈述
2016 年 9 月	中国发布《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
2016 年 9 月	促成《二十国集团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
2016 年 12 月	中国国务院出台《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
2017 年 8 月	中国发布《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
2017 年 12 月	中国推出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示范区
2018 年 6 月	中国与联合国多个机构在联合国总部举办“‘一带一路’倡议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高级别研讨会”
2019 年 9 月	中国发布《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19)》

者,而且为推动国际社会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身体力行地发挥出了越来越大的领导力。在中国与部分国家的双边合作中,企业社会责任也成为其中的内容,其中,中德、中瑞、中荷政府间在相关领域的合作项目影响较大。

中德贸易可持续发展与企业行为规范项目。中德贸易可持续发展与企业行为规范项目(简称“中德CSR项目”)启动于2007年。该项目通过开展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研究,协助、支持政府部门完善企业社会责任政策,在七年间共向15个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门提交了24条政策建议;协助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等制定并发布行业社会责任指引;举办了182场针对社会责任不同议题的国际研讨会、论坛等。

中瑞企业社会责任合作项目。中瑞企业社会责任项目是目前为止中国持续时间最长的政府间企业社会责任合作项目,起始于2007年6月。中瑞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开展11年来,成效显著:一是开展了18期中瑞企业社会责任培训班,是中国社会责任领域持续时间最长的培训项目之一;二是建设中瑞企业社会责任合作网(www.csr.gov.cn),是中国社会责任领域唯一的政府网站,网站累计访问量超过1500万人次;三是组织两次“中国企业社

会责任考察团”赴瑞典考察；四是开展包括“中国-瑞典企业社会责任论坛”等多项交流活动；五是支持国家责任竞争力、瑞典在华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案例等研究。

中荷企业社会责任项目。中荷企业社会责任项目是由荷兰王国驻华使馆资助、中国国家商务部主管、由中国国家信息中心执行的双边合作项目，合作时间为2008年5月至2014年12月。项目组织了相关培训和研讨会，开展了企业社会责任监测和评价系统建设，搭建了多种利益相关方沟通平台。

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

改革开放后，各类国际组织走进中国并加强在中国的机构建设，并通过自身的智力和资源促进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随着企业对中国的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渐趋复杂化，以及可持续发展逐步成为全球共识，国际组织也逐渐调整其在中国的工作内容和发展策略。特别是加入WTO以来，中国与国际组织的深入合作，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国际资源和经验。

在华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组织既有全球性或地区性政府间国际组织，也有国际性的非政府间社会责任专业机构。政府间国际组织以联合国专门机构和国际发展组织为主，如联合国发展规划署（UND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联合国妇女署（UN WOMEN）、国际劳工组织（IL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全球环境基金（GEF）等；非政府间社会责任专业机构包括诸如欧洲对外贸易协会（CSR Europe）、全球贸易协会（amfori）、全球报告倡议（GRI）、国际商业领袖论坛（IBLF）等专门关注企业社会责任机构，也包括在华部分外国商协会的社会责任或可持续发展部门。

1. 从经济援助到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为满足中国经济发展对资金和人才的大量需求，一些国际组织对华开展了包括赠款、贷款在内的经济援助，对合作项目以提供资金支持为主。

以世界银行为例，作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世界最大的资金和知识来源，世界银行集团致力于推动共同繁荣，促进可持续发展。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早期，世界银行援助战略的首要目标是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世界银行在中国的投资逐步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调整，注重减贫和环保战略，如关注空气污染、改善商业环境以推动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推动环境的可持续性、推动绿色经济等。截至2018年8月，世界银行共对华投资了567个项目，其中涉及环境、气候变化、水资源等可持续发展主题的项目有1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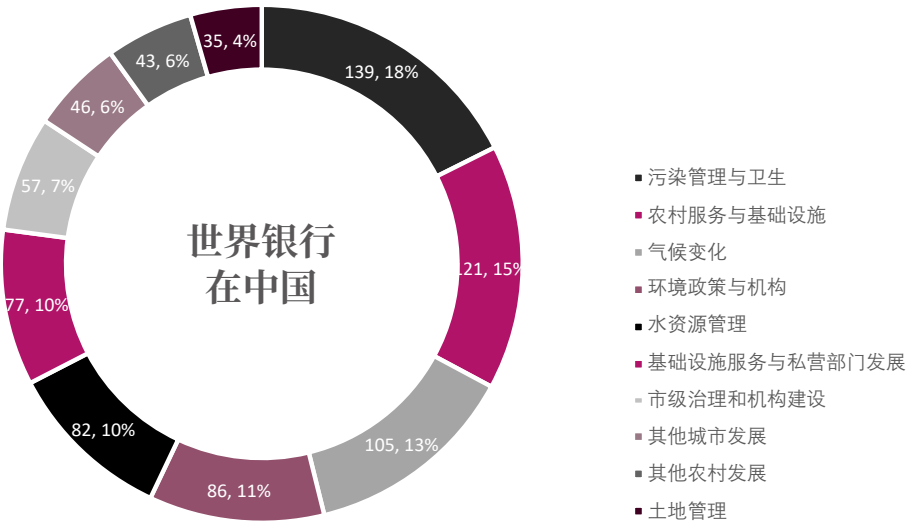


图 4-2：世界银行项目主题 [1]

个，占比29.6%。

除了资金支持外，国际组织利用其全球视野、经验优势和人才储备，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解决方案。例如，1979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批准了第一个援华方案并在中国设立代表处。四十年来，作为联合国从事发展的全球网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充分利用其全球发展经验，支持中国制定应对发展挑战的解决之道，并为中国开展南南合作和参与全球发展提供协助，在减少贫困、善治、危机预防与恢复及能源与环境方面投入了资金、技术和人才。

又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支持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CCCMC）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推动上下游企业和利益相关方发起责任钴业倡议，致力于建立负责任且可持续的钴供应链。

2. 传播国际理念和交流实践经验

在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国际先进理念的引进和本土化方面，国际组织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例如，CSR Europe自2005年起每年在中国同《WTO经济导刊》联合主办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论坛向中国企业传播社会责任理念，介绍全球最新的发展趋势，影响了数千家中国企业。自2015年起，联合国妇女署在北京、杭州等地主办“性别

1 “世界银行：所有项目”，载世界银行中国办事处官网，<http://projects.shihang.org/search?lang=zh&&searchTerm=&countrycode_exact=CN>（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平等与企业社会责任国际会议”，系统地向中国各类利益相关方介绍了性别平等与企业社会责任以及将性别纳入企业治理和管理等理念和国际实践。

国际组织通过论坛、考察、网络平台等形式，向中国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和消费者传播国外企业优秀实践，有效启发了一批中国先锋企业首先行动起来，履行社会责任，带动中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例如，中国欧盟商会、上海美国商会等外国在华商会发起了企业社会责任论坛，致力于推动会员企业就企业社会责任理念与实际操作的发展进行交流与分享。全球契约及其中国网络每年收集并推广中国企业遵循其十项原则的良好实践，传播中国可持续发展成果。

3. 多方合作促进能力提升

国际组织还利用其专业技术和国际网络，通过建立地方合作网络为中国的行业、企业和其他相关方通过培训和技术指导等措施，挖掘其履行责任的潜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例如，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在侧重于建立业务支持机构和政府的能力，为中小企业采取负责任的业务做法提供有利环境。UNIDO与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CNTAC ）合作，从2006年开始为希望自愿实施劳动和环境升级计划的企业提供全面综合的企业社会责任培训、咨询和信息服务能力建设。国际劳工组织（ILO）从2008年开始将SCORE（企业可持续发展）项目引入中国，通过培训和现场咨询改善参与企业的工作场所实践，从而提升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竞争力。到2018年底，全球契约中国网络已为上千家企业提供了如何实施全球契约十项原则的培训。

国际组织还通过实施指南和标准提升参与全球供应链的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管理能力和绩效水平。例如商界社会责任倡议（BSCI）和道德贸易倡议（Ethical Trade Initative）等供应链团体标准均致力于改善全球供应链中所有行业和采购国家的工作环境，并通过审核和培训等措施，促使供应链上的企业提升了社会责任意识和能力。

三、行业组织

改革开放以来，来自政府与市场两方面的力量推进着中国行业组织（协会、商会）的发展。早期的行业组织由政府结合自身改革，加强行业管理而成立，如1979年成立的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质量管理协会和1980年成立的中国包装技术协会等。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市场和企业的需求逐步成为推进行业组织发展的主要力量。20世纪90年代国家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目标后，行业协会发展进入快速增长期。中国加入WTO后，行业组织在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行业全球化发展、解决贸易争

端等方面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行业组织也在建立行业规范，引导企业行为方面不断发力，成为推动中国企业生态发生变化的重要力量。尤其是，2005年以来，部分全国性和地方性行业组织在推进行业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1. 倡导行业可持续发展战略

首先，行业组织承担起规范行业发展的职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中国政府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提出要发展市场中介组织，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的作用，把不应由政府行使的职能逐步转交给企业、市场和中介组织。因此，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对行业组织的作用做了出明确要求，即“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1]

其次，企业社会责任成为行业健康发展的有效抓手。行业组织在规范行业建设中，通过倡导社会责任理念、制定社会责任标准和指南、加强供应链责任沟通与协作以及推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绩效评估等措施建立起行业的社会责任工作系统，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例如，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都先后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体系或指引，鼓励行业内企业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再者，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行业集体行动成为必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进入中国的国际社会责任规范，对于刚刚融入全球供应链的广大中国企业而言既是市场动力也是业务压力，使得企业对社会责任相关的公共服务和支持框架的需求越来越大。因此，无论是在启蒙更多行业企业一致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行动方面，还是就社会责任问题进行国际对话和磋商，在行业层面采取联合的集体行动就成为一种必然。例如，根据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社会责任工作机制的建立是在“中国纺织产业逐步融入国际产业链，融入国际采购供应链过程中”国内百余家纺织企业发出的倡议，以便“适应国际零售商和国际品牌商的实际需求，解决过去对供应商、生产企业审核或认证中存在的渠道混乱、重复认证、成本高、管理困难等种种问题”。[2]

2. 建立推行行业社会责任标准

行业组织的社会责任工作，首先体现在建立行业社会责任标准规范上。此类标准规范以行业社会责任指南、管理体系或准则为主体，为行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统一的

1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载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40531/40746/2994977.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2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任建设推广委员会：“百家纺织企业倡议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建设”，载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官网，<http://www.csc9000.org.cn/news/responsibility/2016-06-15/11.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行动指引和绩效参考。据不完全统计，2006年以来，已有40余家全国和地方层面的行业组织发布了行业社会责任标准、指南或准则。

行业社会责任标准规范的建设首先由外向型行业发起，并经过十年左右的历程引入和推广到以内需市场为主的行业和海外投资中来。

2005年5月，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时称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成立了社会责任建设推广委员会，并设立社会责任办公室，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社会责任常设机构。同年，该会发布面向全国纺织服装企业的《CSC9000T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首开中国行业社会责任建设的先河。

2008年4月，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联合10家全国性工业协会（联合会）共同发布了2008版《中国工业企业及工业协会社会责任指南》。该指南倡导和推进中国工业企业和工业协会履行社会责任，使社会责任理念和工作机制及于更广泛的中国工业领域。

2010年11月，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发布首个中国企业海外社会责任建设自愿性标准《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行业社会责任指引》，引导对外承包工程企业以更加负责任的方式开展对外承包工程业务。2014年，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发布了《中国对外矿业投资社会责任指引》，为中国矿业企业的海外投资提供了系统化的社会责任指导。

3. 系统支持企业社会责任实践

部分行业组织在为行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标准和指引的同时，通过加强能力、推进管理体系、开展评估与评价、推荐典型实践、搭建交流平台，推动信息披露等工作，规范、指导和监督行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鼓励企业结合自身特点和行业特色开展社会责任实践，探索社会责任管理和实践范式。

第一，能力建设。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自2008年起，每年均邀请社会责任领域专家，面向全行业企业开展社会责任公开培训，并于2011年建立了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工作坊。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从2007年起联合BSCI对中国供应商开展社会责任基础和专题培训，目前已经覆盖各行业出口型企业的管理者过万人。

第二，评估评价。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自2009年起，举办五次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评价活动，截至2018年，已有累计逾百家会员企业参与社会责任绩效评价活动。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从2014年开始推出“中国工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星级评价”，并于2016年发布“社会责任星级企业CIC-STARS标识”。

第三，良好实践。2007年，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举办“跨国公司社会责任高峰论坛暨优秀企业社会责任案例展”，推出数十个在华外资企业社会责任优秀实践；2014-2017年，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连续举办“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优秀实践案例”征集活动，并对优秀实践案例进行表彰。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则从2009年开始每两年编制一本《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行业社会责任优秀案例》。

第四，交流平台。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自2005年起连续每年举办行业企业社会责任年会，已经成为行业社会责任交流的重要平台。此后，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协会、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以及中国互联网协会等也先后举办各自行业的社会责任年会，得到了政府、行业内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和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协会社会责任委员会还积极促进与相关国际性社会责任标准组织合作，推动国内外标准的互认工作。

第五，信息披露。2008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推出中国第一个行业层面的社会责任报告指南《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纲要CSR-GATEs》，并从2014年开始推出了在线报告编制和发布平台。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自2009年起，每年组织“中国工业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会”，旨在为中国工业行业企业提供社会责任展示和交流平台。截至2018年，已有近730家（次）中央企业、地方国有骨干企业、外资企业和优秀民营企业在这个平台上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四、社会组织、媒体及学术机构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政府逐渐简政放权，使得公众可以通过社会组织等形式参与社会治理，中国的民间组织由此发展起来。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重大社会事件的推动和影响，中国民间社会组织迅速发展。2008年，南方冰雪灾害和“5·12”汶川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激发了民间的公益热情，2008年被称为“中国民间公益元年”。此后，中国民间公益在曲折中走上专业化、组织化、协同化的道路，民间公益组织开始逐步发展。

根据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统计，社会组织截至2019年11月21日，全国社会组织共849795个，，其中民政部登记社会组织共2298个[1]。

社会组织、媒体、学术机构等组织与企业的联系越发紧密，不同的组织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共同推动了社会问题的解决和企业生态的发展。

1 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实时统计数据。

1. 社会组织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政府的规范和监管之外，社会组织的监督是企业被动改善社会责任绩效的重要力量。社会组织自身的使命和特点，决定了它们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主要维护者之一,对于企业在环境保护、劳工权益、消费者维权等领域往往给予了广泛的关注与保护。

环保领域。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生态环境类社会团体与生态环境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共7433个[1]，环保民间组织活动领域也从早期的环境宣传及特定物种保护等，逐步发展到为环保事业建言献策，开展社会监督，以及组织环保领域的公众参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是促进企业关注环境绩效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民间组织之一。自2006年6月成立以来，IPE 致力于收集、整理和分析政府和企业公开的环境信息。通过信息公开的平台，公众可以直观了解企业的污染数据，进而倒逼企业改善其环境绩效。

劳工领域。劳工维权类民间组织从违规监测和法律援助等方面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一方面，对企业用工行为进行监督，揭露其中违法行为，利用舆论力量促使企业改善用工条件。一方面对务工人员进行法律援助和培训，提高他们的维权意识和能力，以应对企业的侵权行为。

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消费者协会和其他消费者组织是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社会组织。截至2016年，全国县以上消费者协会已达3000多个。2这些组织对企业产品质量、销售途径、尊重消费者合法权益，以及消费者权益争议解决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监督作用，同时也推动了企业在消费者议题责任上的持续改进。

除监督企业的社会责任外，社会组织还通过与企业的建设性合作共同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社会组织与企业的合作传统上是单纯的筹款与提供资金资助的关系，项目由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社会组织负责实施。解决可持续发展挑战所必需的多方合作在近年来改变了这种范式，使得企业与社会组织越来越多地以跨界合作的形式来达到共同的目标。这种合作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激励越来越多的企业建立了自己品牌的基金会。

而以基金会为例，伴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的实施，全国基金会总数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截止到2018年9月6日，全国共有6826家基金会。[3]目前中国的基金会工作已涵盖联合国2030可持续议程的全部17项目标，其中涉及目标

1 马茜，夏冰：“社会组织是多元共治的重要力量”，载《中国环境报》2017 年 4 月 25 日，第 3 版。

2 “中国消费者协会：协会地图”，载中国消费者协会官网，<http://www.cca.org.cn>（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20 日）。

3 数据来源：基金会中心网 <http://data.foundationcenter.org.cn>（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4(优质教育)、1(无贫穷)、11(可持续城市和社区)、10(减少不平等)、3(良好健康与福祉)的基金会数目最多,总计超过60%,且超过 80% 的中国基金会工作涉及可持续发展目标。[1]基金会的众多项目为企业开展社会责任项目,参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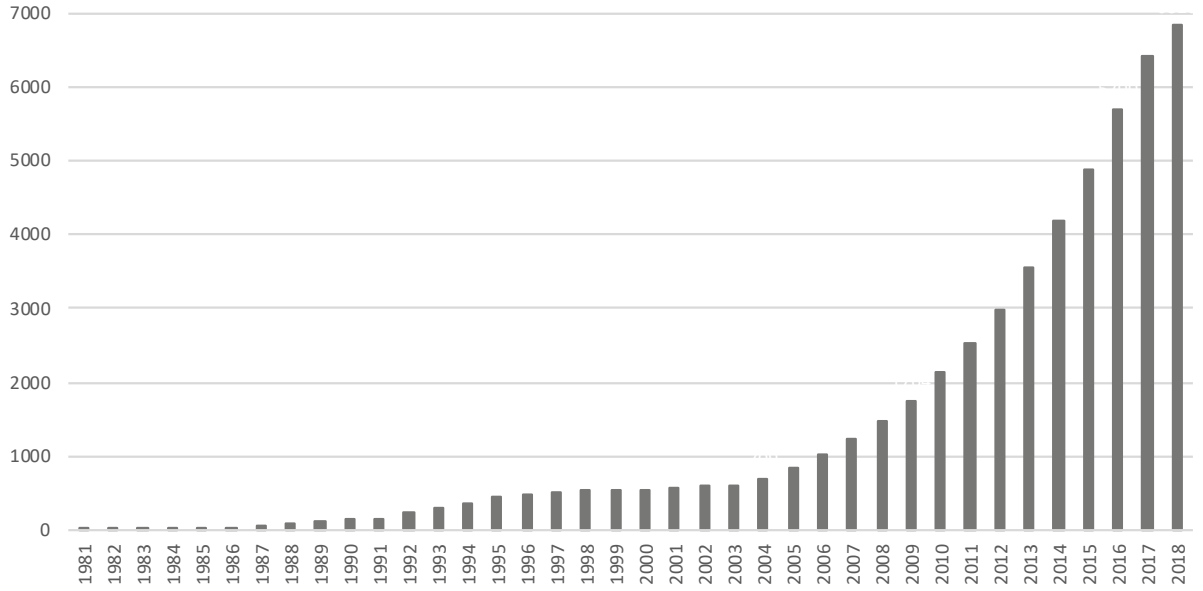


图 4-3: 基金会总数量趋势图

数据来源:基金会中新网数据中心,以上数据根据基金会信息披露情况每日进行更新

进入21世纪,互联网技术不仅对传统产业进行了升级改造,也在深刻影响着社会组织的运作方式,加深了社会组织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社会组织利用平台类互联网企业的服务进行倡导和筹资,招募志愿者,借此连接了更多的企业,也发动了公众的力量,推动了公益组织的发展,也创新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工作方式。例如,一年一度的全民公益活动"99公益日"由企业发起,通过移动互联网、社交化等创新手段联合了数百家公益组织和企业,并深刻影响着社会大众的可持续发展观念。

此外,社会组织还是企业与其他利益相关方沟通的重要桥梁,帮助企业与相关方进行沟通,促进企业在社区的发展。

2. 媒体营造"向善"的社会氛围

在现代社会,媒体作为"社会公器",是参与社会治理、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之一。由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过程和我国公民意识的建设过程基本处于同步发展,

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基金会中新网:"慈善与可持续发展——中国行动",载"慈善与可持续发展——中国行动"官网,<http://sdg.foundationcenter.org.cn/about.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20 日)。

在这种状态下，媒体对社会责任理念的普及和推动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媒体通过报道记录反映时代变迁；另一方面，正确的舆论导向又可以增强市场道德规范，引领和加速社会变化和发展。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新媒体（自媒体）作为一种新型传播形态，深刻影响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

监督报道“不负责任”的企业行为。改革开放以来，媒体作为社会监督者，对企业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进行了大量的批评报道，激发了全社会对假冒伪劣产品的关注和监督，进而推动政府部门加大处罚力度，不断规范企业的市场行为。其中具有标志性的代表是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自1991年起每年一度的特别报道节目——3·15晚会。

传播社会责任理念和实践。2006年以来，媒体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报道量逐年显著加大。媒体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高强度关注和报道，引发了公众的更多关注，也推动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认知和全面了解。与此同时，部分媒体深度关注企业社会责任，通过设立企业社会责任专栏（专题节目）、举办企业社会责任专题论坛、开展企业社会责任评估和评价等方式，推动全社会形成弘扬企业社会责任，实现企业创造经济、环境和社会综合价值的局面。

随着媒体形式的发展，网络媒体、新媒体也正成为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强大力量。企业社会责任中国网（www.csr-china.net）、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指南（CCM）项目（www.chinacsrmap.org）、中瑞企业社会责任合作网（www.csr.gov.cn）等网站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内涵和发展趋势，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企业实践、相关组织等内容有详实的报道。同时，一批以社会责任为重点内容的微信公众号，也由企业社会责任领域专业服务机构和专家建立起来。

3. 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和人才培养

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等学术机构担负着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理论建构、实践提升和未来领导力培养的重任，同时也是公共议题和社会理念的重要塑造者。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全球企业社会责任的迅速发展，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的环境和社会挑战逐渐凸显，企业社会责任逐步引起中国相关学术机构及一批学者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出现了部分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论文和著作。进入二十一世纪，有关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学术研究逐步丰富。如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中所收录的文献中，在数据库高级检索框中，以“企业社会责任”为字段检索词，总计可搜索获得1998—2018年间的中文文献1826篇，这1826篇文献总计涉及管理学、经济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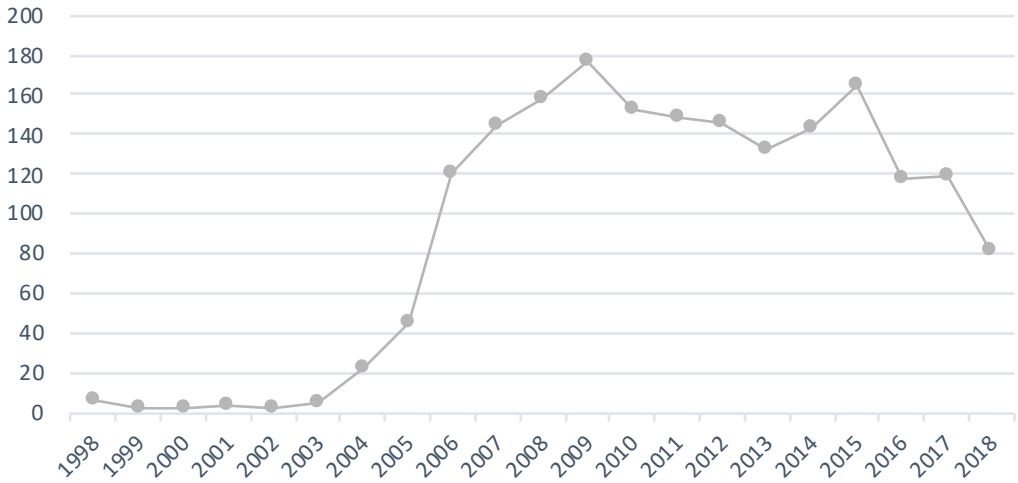


图 4-4："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文献的年度分布

信息来源：郭毅，叶方缘，2019[1]

表 4-2：1998-2008 年中国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阶段划分

阶段	时间	研究重点
起始阶段	1998-2003 年	从企业的本质、企业与市场的关系等角度对"企业是否要承担社会责任"以及"企业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等问题进行研究。
发展阶段	2004-2009 年	从中国企业国际市场融入和国内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设等角度关注企业的社会功能以及社会责任如何推进可持续发展，研究议题上聚焦环境问题、劳动关系、企业文化与企业竞争优势。
平稳阶段	2010-2015 年	研究重点为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问题、企业财务绩效、公司治理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等。
议题化阶段	2016-2018 年	学术界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议题呈现多样化，研究内容涉及的利益相关者有交易伙伴（包括股东、债权人、员工、消费者、供应商等）、外部环境（包括政府、社区、媒体、环保组织等）和间接影响客体（包括自然环境、生物多样性等）。

备注：作者根据郭毅、叶方缘《1998-2018 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一文整理。

学、哲学、社会学、新闻与传播学、政治学和环境科学等20类学科。

学术机构还承担了为企业和社会培养专业人才的职责。早在2004年，北京大学法学院就开设了"工商业与人权"课程，这是中国在相关领域第一个得到教育部认可的专业课

1 郭毅，叶方缘："1998-2018 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18 卷第 2 期，第 11 页。

程。此后，商学院开始在传统的商业伦理教育上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理念。近年来，中国的商学院积极引入和传播社会责任，特别是在MBA教育中引入了商业伦理课程。2009年，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修订了MBA培养基本要求，要求MBA培养院校课程中将企业社会责任和商业伦理方面的课程纳入MBA培养计划。此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等商学院自2010年起连续举办十届“全国商学院企业社会责任教学研讨会”，成为商学院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教学工作的标志性活动。

第五章

5

第五章
中国企业生态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关于未来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决策者通过持续的政策生态的变革不断改造中国企业在主体层面的生态，使企业在迸发出巨大潜力的同时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并最终撬动中国社会中企业的各类利益相关方为自身或公众利益反作用于企业的影响，从而在促进企业更负责任、更可持续发展的同时，逐渐构建起基于社会共同利益和共享价值的企业社会生态。应该说，这不仅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自身国情的逻辑，而且在40年间推动了政策（政府）、生产力（企业）和社会（相关方）在互动中的共同成长。因而，可以说是经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或模式。

面对未来，中国企业生态的与社会的双重可持续发展不仅对于中国至关重要，而且会随着中国企业和社会各方不断增长的国际影响力而对全球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良性的中国企业生态与社会发展的延续与推进，仍然需要从以上三个方面着力。

一、开启政策引擎，激发高质量企业生态推动力

首先，中国的决策者仍然需要注重政策在推动中国高质量企业生态发展方面的决定性作用。这首先意味着，中国政府必须为各类企业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和释放经济潜能提供政策供给。例如，2018年以来，中国政府不断强调“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并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就是持续支持非公有制经济释放潜

力的政策保障。当然，具体政策可以包括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完善政策执行方式、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等（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外资企业而言，提高外商投资政策的透明度，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国民待遇），实行高水平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产权保护，都对于外资企业扎根中国市场具有决定性影响，而这些也正是于2019年3月正式通过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主要内容。就国有企业来说，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激发国有企业各类人才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各类要素活力等措施是国有企业焕发新的市场力量的必由之路，同时，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不断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上述各类政策的落实，将在中国构建更加开放、自由、包容、公平和有活力的企业生态，也必将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腾飞提供动力。

其次，中国政府还需要特别注重在负责任企业行为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政策推动力。这意味着在进一步激发企业生产力和活力的同时，还应构建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经济增长政策体系，使得各类社会、环境要素都可以内部化为经济体系的成本或收益，进而促使经济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也即真正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具体而言，这就要求政府将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要求纳入行业准入、企业信用评定、财政与金融支持、投资促进、监管评价，以及可持续消费和政府采购等政策机制，也即通过升级企业支持、引导和监管政策对企业负责任经营和可持续发展提出明确期望。

最后，中长期来看，中国的企业生态政策还应该注意到“人文发展”或“以人为本”的社会责任议题将凸显为构建中国高质量企业生态和社会可持续性的主要矛盾。近年来，一系列最有影响的企业的社会影响件都表明了这一主要矛盾的泛起。因此，未来中国在处理企业生态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政策走向应是“绿色发展”与“人本发展”并重，而“人本发展”的落实则必然要求更多关注人的基本权利，以及个人或群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各种机制的构建。这一趋势以及由此产生的挑战同样存在于中国政府对中资企业在海外经营的引导和规范政策之中。“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关注环境议题。但实际上，与人和社区关系相关的社会影响是中国海外投资面临的最紧迫、最密集的挑战，而且即使在各种环境事件的表层之下，真正的冲突仍然事关人和社区关系。2018年8月，习近平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特别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意义在于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而“国际道义高点”的占据则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更好地管理中国海外投资的劳工、人权、社区和社会影响。中国政府于2018年呼吁“一带一路”合作的所有市场参与方“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遵守联合国全球契约”就是一个正确而重要的政策导向（《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

二、强化主体作用，提升企业生态自我完善能力

企业既是企业生态的缔造者和参与者，更应该是其维护者和完善者。40年来，改革开放向企业提出的最宏大、最长远也是最深刻的挑战就是企业如何在利用发展机遇的同时处理好自身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也即构建主体层面的企业生态。随着时代的变迁，企业必须意识到，负责任经营和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当下和未来企业生态的资源分配系统与竞争和择优系统，企业将对经济、社会和环境负责的理念与自身核心资源、生产经营相结合，将是企业的价值创造和业务持续性的关键保障。

对企业内部而言，负责任地经营可以帮助企业获取和维持高水平的雇员，形成积极、合作的企业文化，促进创新和提高运营效率；对企业外部而言，负责任的处理各方关系可以为企业带来声誉等无形资产，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因此，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直接决定了企业获取内外部资源的能力，这也使得“社会责任”本身已经演化成为一种异质性资源，成为企业竞争力的来源之一。

对于这一资源的利用首先要求企业在战略和文化上将企业发展与社会福祉看作协调同一的主体目标，在商业决策和社会影响方面遵循“共享价值”原则，将自身的资源、专业知识以产品和服务的形式投入到社会需求，在实现企业经济目标的同时赢得可持续竞争优势和推动社会进步；另一方面，企业生产运营产生的产品与服务最终要依赖消费者、客户和利益相关方的认同来实现价值，而消费者、利益相关方对企业战略和文化的认同将对这种价值实现产生溢价。这里需要强调一个对于企业和社会都尤为重要的方面，即企业还须注重利用产品、服务、模式等方面的创新来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归根结底，企业应该应该按照兼顾经济目标和社会与环境影的基准方法认识并践行社会责任，部署战略和资源，同时改善企业的商业生态和社会的价值生态。

其次，在新技术推动下形成且不断深化的全球供应链既是企业生态的载体，也越来越是企业的社会影响风险的集中区域和传递机制。因此，企业在业务和社会影响领域的竞争已经上升并蔓延到供应链层面，这要求全球供应链的每个参与者都以可持续的生态理念处理供应链上的商业和社会关系。一方面，企业要实现全球供应链上资源、生产、服务和消费的有效连接，塑造支持业务发展的供应链；另一方面，在全球供应链之下，企业必须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妥善处理与供应链商业伙伴之间的合作与价值分配关系，以及与供应链延伸之所及的各类相关方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而构建有新任、有弹性，也有问责的供应链生态系统。

同样，随着中国企业越来越成为全球行为者，企业还必须在海外经营和海外企业生

态的构建中关注“人文丝路”的构建，也即密切关注自身对当地劳工、社区和社会的影响，有效利用包括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及人权标准在内的国际标准管理相关风险，有意识地扩大投资项目的民生外延和良性社会影响，使“人本”成为责任重心，也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最强大的黏合剂。

三、优化社会参与，完善企业生态外部支持系统

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社会力量和公众参与能够有效地影响企业的行为方式及其处理社会影响的策略。作为企业利益相关方，社会组织和公众是社会价值和共同目标的坚守者和传播者，因此，它们既可以是企业社会影响的有效监督者，也可以是企业社会议程的有力支持者，还越来越是与企业解决共同的社会挑战的有机合作者。而社会商业文明的进步和公民素质的提升又进而会要求企业以更加负责任的行为进行生产和经营。因此，社会组织有助于持续完善“价值层面的企业生态”，形成促进企业履责的社会生态环境，从宏观上保证企业发展目标与社会总体目标的协调一致。

这首先要求在大力支持包括消费者、环保、劳动者维权等各类社会组织合法成长和发展的基础上，赋予其参与公共治理的权利，使其能够在与企业的互动关系中充分发挥作用。例如，自“十八大”以来，为了纠正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生态环保赤字，中国在环境治理方面在除了强化法制之外，更是大胆地采用了结合了环境目标导向与社会管理方式创新的“社会责任”路径，也即基于企业的环境影响引入利益相关方的意见、监督与合作，这可以说是中国利用利益相关方行动推动企业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成功范例。具体而言，这些机制包括了含强制性公众咨询环节的环境影响评估制度、企业环境信息面向公众的披露制度、强制性的环境公众参与制度以及环境领域的技术提升和供应链协作等。与传统的仅关注特定领域的“法制环境”的法制路径不同，“社会责任”路径在促进“绿色发展”的同时，本身也锤炼和促进了中国社会的“人文发展”，为自然性的生态环境构建了有活力的社会性生态，因为这一路径下的相关制度为环境保护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动员了必需的社会力量，建立了必由的社会机制，从而实现了企业、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多重目标。这一成功经验未来值得向其他与企业的社会影响相关的领域延伸推广。

此外，社会参与企业生态以及企业与利益相关方的对话与合作，也可以有效地配置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资源，提高整个社会生态的资源利用效率。这也要求各类社会组织提高自身介入企业社会影响和可持续发展事务的能力，并且根据自身的使命和资源在促进企业负责任经营和可持续发展方面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例如，各类社会组织可以从自身关注的角度出发，通过社会监督、对话与合作等方式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媒体在披露企业的消极影响的同时，也可以强化负责任的企业实践的挖掘与传播，还可以通过影响

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塑造市场价值和社会氛围；各类院校可以就企业的社会、环境影响开展研究，形成解决相关问题的有效知识供给，同时也可开设相关课程或教育项目，培养具有责任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人才；行业组织可以通过标准建设、企业评价、宣传培训、企业咨询等服务，推进行业社会责任自律，并可以积极与有关国际组织和机构开展交流合作，参与国际社会责任标准指南制定与落实，包括建立“一带一路”上的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合作推进机制。

附

录

附录 1：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企业生态与社会发展大事记

时 间	领域	事 件
1978 年	环境	3月，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出："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对环境保护做出的宪法规定，为环境法治建设和环保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综合	5月10日，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由此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综合	12 月18～22 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做出了从 1979 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1979年	经济	7 月1 日，全国人大第五届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中国颁布利用外资的第一部法律。
	环境	9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第一次从法律上为实现环境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综合	10 月20 日，《人民日报》发表真理标准讨论的姊妹篇《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
1980年	经济	4月17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恢复中国在该组织的代表权。
	经济	10 月17 日，国务院通过《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指出应当逐步改革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积极地开展竞争，保护竞争的顺利进行。
1981年	经济	7 月7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强调个体经济是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
	经济	10月26～29日，我国第一个行业管理组织——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在北戴河召开成立大会。
1982年	综合	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
1983年	环境	在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时任副总理的李鹏代表国务院宣布，环境保护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1984年	经济	3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并于1985年4月1日施行。
	环境	5月1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环境	12 月8 日，国务院批准设立国家环境保护局。
	社会	12月,全国性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中国消费者协会在北京成立。
1985年	经济	3月7 日，国务院批准国家标准局发布《产品质量监督试行办法》。
	社会	9月15 日，国务院批准国家科委制定的《关于抓一批"短、平、快"科技项目，促进地方经济振兴》的发展计划，即"星火计划"。
	经济	12 月28 日，我国颁发首批专利证书大会在北京举行，143 项专利申请者领取了专利证书。

时 间	领域	事 件
1986年	环境	1月12 日, 国务院发布《节约能源管理暂行条例》。
	综合	4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通过, 并于1987年1月1日施行。
	社会	4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通过, 确立九年制义务教育。
	经济	10 月, 国务院成立外国投资工作领导小组。11 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 鼓励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经济	11月18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八六三”)纲要》。
1987年	经济	4月2日,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评选揭晓,20位企业家荣获由国家经委授予的荣誉称号。
	环境	5月22 日, 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正式发布《中国自然环境保护纲要》。
	经济	8月5日, 国务院发布《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
	环境	9月5日, 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1988年	经济	3月25日至4月13日,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1989年	经济	10月4日, 我国加入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
	社会	10月,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实施“希望工程”。
	环境	11月6日, 中国当选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理事国。
	环境	12月20～26日, 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1991年	环境	6月18～19日, 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 并通过旨在推进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的《北京宣言》。
1992年	社会	3月8日, 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
	社会	3月20日-4月3日, 第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环境	7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 首次在中国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1993年	经济	2月22日,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经济	8月26日～9月2日, 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经济	10月22～31日, 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社会	10月22～31日,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

时 间	领域	事 件
1993年	综合	11月11～14 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我国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和基本内容。
	经济	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1994年	环境	3月25日，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这是全球第一部国家级的21世纪议程。
	社会	4月，国务院颁布《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我国正式进入开发式扶贫新阶段。
	社会	4月，在全国工商联七届二次常委会上，10名民营企业家联名发起“光彩事业”。
	社会	6月28日-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并于1995年1月1口起施行。
1995年	环境	8月，国务院签发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流域性法规——《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
	环境	10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环境	国家在制定“九五”规划中，明确将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国家战略。
1997年	环境	10月27日-11月1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1999年	经济	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该法于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
	综合	3月5—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十六条现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营经济实行导、监督和管理。”
	社会	6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对捐赠和受赠、捐赠财产的使用和管理、优惠措施、法律责任进行了界定。
2001年	社会	10月27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并于2002年5月1日起生效。
	经济	11 月10 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 WTO 的决定，标志着中国长达 15 年复关和加入 WTO 进程的结束，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标志着我国全面重返世界经济舞台。
2002年	环境	6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该法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
	社会	6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安全生产法》，该法于2002年11月1日起施行。
2003年	环境	1月，国务院印发《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

时 间	领域	事 件
2004年	社会	3月11日,《最低工资规定》正式施行。
	社会	2月11日, 国务院第39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基金会管理条例》。
2005年	综合	10 月27 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次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明确提出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2006年	综合	9月, 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
2007年	社会	2月24日,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企业所得税法》, 第九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综合	3月, 在第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刘卫东、王淑媛、楼忠福分别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倡导企业展行社会责任的建议》、《关于政府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议》和《关于制定促进企业公民建设指导意见的建议》。
	综合	3月16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这是我国首次从法律上明确保护私人财产。
	综合	4月, 中德贸易可持续发展与企业行为规范项目正式实施, 到2014年6月结束。
	社会	6月24～29 日,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经济	8月30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自2008年8月1日起施行。
2008年	综合	1月4日, 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
	环境	2月26-28日,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综合	4月13日至18日, 商务部举办“中瑞企业社会责任培训班”。
	环境	5月, 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 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的社会责任承担工作和环境信息披露提出明确要求。
	社会	5月12日14时28分, 在四川省汶川地区发生里氏8级强震。6月8 日, 国务院公布《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个专门针对一个地方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条例。
	环境	7月23 日, 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全民节能行动, 会议通过《公共机构节能条例》, 自 2008 年10 月1日起施行。
	环境	8月25-29日,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
	社会	9月11日, 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产品召回声明, 称经公司自检发现2008年8月6日前出厂的部分批次三鹿婴幼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 市场上大约有700吨, “三聚氰胺”事件爆发。
	社会	9月18 日, 国务院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时 间	领域	事 件
2009年	综合	1月12日，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了《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企业社会责任指引》。
	综合	9月9日，商务部在“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研讨会”上，以征求意见的形式发布了《外资投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指导性意见》。
	环境	11月26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会议决定，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
2011年	综合	9月，国资委发布《中央企业“十二五”和谐发展战略实施纲要》，提出建设诚信央企、活力央企、绿色央企、平安央企和公民央企。
2012年	环境	2月27-29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的决定。
	社会	4月28 日，国务院公布《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综合	6月，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中央企业社会责任指导委员会。
2013年	综合	2月，商务部召开“中国企业走出去履行社会责任”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企业走出去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以及发布《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
	环境	9月12日，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设定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目标，即经过五年努力，使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重污染天气较大幅度减少；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空气质量明显好转。
	经济	11月9日-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
2014年	综合	5月，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履行社会责任指引》，明确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
	社会	6月，国务院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这是我国首部国家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项规划。
	综合	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将“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立法”作为“加强重点领域立法”的任务之一。
	社会	12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对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作出了系统安排。这是我国慈善领域第一个以国务院名义出台的纲领性文件。
2015年	综合	6月2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批准发布了以“36000”数字为系列的三项国家标准：GB/T 36000-2015《社会责任指南》、GB/T 36001-2015《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和GB/T 36002-2015《社会责任绩效分类指引》。
	环境	9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经济	9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国有企业被分为公益类，以及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主业处于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三类。
	社会	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时 间	领域	事 件
2016年	经济	1月15日，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础发展规划（2016—2020年）》，首次从国家层面确立了普惠金融的实施战略。
	社会	3月16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社会	5月30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综合	7月，国资委印发《关于国有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
	经济	8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消费品标准和质量提升规划（2016-2020 年）》。
	环境	8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
	环境	11月22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的意见》，就贯彻落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的“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体系”作出部署。
	社会	12 月2 日，《“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发布。《规划》明确了“十三五”时期脱贫攻坚总体思路、基本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提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是未来五年各地区各部门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的行动指南，也是制定相关扶贫专项规划的重要依据。
	综合	12月，国务院出台《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明确中国将在“十三五”期间创建10个左右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
2017年	综合	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其中多项条款涉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经济	5月14～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
	环境	5月，环境保护部、外交部、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
	综合	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将“模范遵纪守法、强化责任担当”作为意见实施的第一个原则，将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内容之一。
	综合	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交部和全国工商联对外发布《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

附录 2：
中国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
政策、规范、指南

序号	机构或单位	时 间	文 件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及国务院颁布的政策文件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015 年	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
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2016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3	国务院	2016 年	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
国家部委颁布的政策文件			
4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8 年	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
5		2011 年	中央企业“十二五”和谐发展战略实施纲要
6		2016 年	关于国有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
7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5 年	《社会责任指南》GB/T36000-2015《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GB/T36001-2015）和《社会责任绩效分类指引》（GB/T36002-2015）
8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7 年	关于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意见
9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5 年	关于保险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
10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2014 年	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履行社会责任指引
11	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2 年	认证机构履行社会责任指导意见和认证机构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提纲指南（试行）
地方政府颁布的政策文件			
12	北京市	2016 年	关于市属国企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
13	上海市	2016 年	关于本市国有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的若干意见
14		2008 年	上海市质监局《企业社会责任》（DB31/421-2008）
15		2012 年	上海市文明单位社会责任报告指导手册（试行）
16		2013 年	上海市文明单位社会责任报告指导手册（修订版）
17		2007 年	上海银监局上海银行业金融机构企业社会责任指引
18		2017 年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指引

序号	机构或单位	时 间	文 件
19	上海市	2007 年	关于推动浦东新区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体系的意见和浦东新区社会责任导则
20		2007 年	浦东新区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若干意见
21		2007 年	浦东新区推进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体系三年行动纲要(2007-2009)
22		2011 年	浦东新区推进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体系三年行动纲要(2011-2013)
23		2011 年	浦东新区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若干意见 (修订稿)
24	浙江省	2008 年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若干意见
25		2012 年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推动全省工业企业积极开展社会责任建设的若干意见
26		2010 年	浙江省银监局《浙江银行业金融机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指导意见》
27		2009 年	杭州市关于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意见
28		2010 年	杭州市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
29		2014 年	杭州市地方标准规范《企业社会责任评价规范》
30		2014 年	杭州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工作的意见》
31		2014 年	杭州市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暨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杭州市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促进办法》
32		2008 年	宁波市和谐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
33		2011 年	宁波市企业信用监管和社会责任评价办法
34		2012 年	宁波市地方标准《宁波市企业社会责任评价准则》
35		2013 年	宁波市最具社会责任企业奖评选管理办法(试行)
36		2008 年	义乌市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评判指标体系
37		2009 年	义乌市企业社会责任评证实施办法
38		2008 年	嘉兴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若干意见
39		2014 年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政府关于推动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若干意见
40		2013 年	绍兴市经信委关于推动工业企业积极开展社会责任建设的若干意见

序号	机构或单位	时 间	文 件
41	浙江省	2014 年	绍兴市柯桥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推动工业企业积极开展社会责任建设的若干意见
42		2017 年	绍兴市越城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推进我区工业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工作方案
43		2013 年	丽水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加强全市工业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若干意见
44		2017 年	永康市关于推动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若干意见
45		2014 年	海盐县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若干意见
46	江苏省	2017 年	江苏省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指导意见
47		2017 年	江苏省企业社会责任建设试点示范实施方案
48		2017 年	江苏省企业社会责任评价基本指南
49		2008 年	无锡市人民政府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50		2008 年	无锡新区企业社会责任导则
51		2009 年	无锡新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试行）
52		2008 年	无锡新区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建设三年（2008-2010 年）行动纲要
53		2004 年	常州企业社会责任标准
54		2005 年	常州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实施意见
55		2017 年	苏州工业园区企业社会责任评估体系
56	广东省	2007 年	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见
57		2015 年	中共深圳市委办公厅、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意见
58		2015 年	深圳市《企业社会责任要求》（SZDB/Z 133-2015）、《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南》（SZDB/Z 134-2015）
59	山东省	2011 年	关于省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
60		2014 年	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DB37/T 2452-2013）、《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DB37/T 2451-2013）
61		2008 年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社会责任考核评价体系实施意见（试行）

序号	机构或单位	时 间	文 件
62	山东省	2010 年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建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激励约束机制的试行意见
63	湖南省	2012 年	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意见
64		2013 年	长沙市企业社会责任评价试行办法
65		2013 年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意见
66	河北省	2016 年	河北省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
67		2017 年	河北省《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要求》(DB13/T 2516-2017)
68		2009 年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 (试行)
69	贵州省	2017 年	贵州省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
70	河南省	2013 年	《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与管理指南》(DB 41/T 876—2013)
71	陕西省	2012 年	关于省属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
72	福建省	2011 年	厦门市属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
73	广西壮族自治区	2015 年	关于全区国有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
74	重庆市	2012 年	重庆市电子信息产业重点企业社会责任考核评估办法(试行)
75	四川省	2008 年	四川省银监局《四川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指导意见》
76	山西省	2007 年	山西银监局《山西银行业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指导意见》
行业协会颁布的政策文件			
77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	2008 年	中国工业企业及工业协会社会责任指南(第一版), 2010 年发布第二版
78		2013 年	中国工业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试行)
79		2013 年	中国工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星级评价组织管理办法(试行)
80		2014 年	首届中国工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星级评价实施办法
81		2015 年	中国工业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指南
82		2016 年	社会责任星级企业 CIC-STARS 标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序号	机构或单位	时 间	文 件
83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2005 年	CSC9000T 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总则及细则）
84		2008 年	CSC9000T 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总则及细则（2008 年版）
85		2018 年	CSC9000T 纺织服务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2018 年版）
86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2017 年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CEFI-CSR1.0）
87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	2012 年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行业社会责任指引
88		2012 年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89		2015 年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评价管理办法（2015 修订稿）
90		2017 年	中国企业境外可持续基础设施项目指引
91	中国建筑业协会	2013 年	关于建筑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
92		2018 年	建筑业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标准（T/CCIAT0002-2018）
93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	2014 年	中国对外矿业投资社会责任指引
94		2015 年	中国负责任矿产供应链尽责管理指南
95	中国银行业协会	2009 年	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企业社会责任指引
96	中国企业评价协会、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2014 年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评价准则
97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2015 年	中国煤炭企业社会责任指南
98	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	2013 年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指南（2012 年版）
99		2016 年	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指南（SJ/T16000-2016）
100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	2016 年	中国信息通行业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2016 年版）
101	中国林产工业协会	2017 年	中国林产工业协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 (团体标准)
102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	2016 年	乳制品企业社会责任指南
103	中国期货行业协会	2017 年	关于期货行业履行脱贫攻坚社会责任的意见
104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	2012 年	中国茶产业可持续发展指南
105	中国农业国际交流协会	2014 年	境外农业投资良好经营及社会责任公约

序号	机构或单位	时 间	文 件
106	中小企业合作发展促进中心、中小企业全国理事会	2013 年	中国中小企业社会责任指南
107	上海市经济团体联合会	2011 年	上海市经团联《企业社会责任指南》(1.0 版)
108	上海市建筑施工行业协会	2008 年	关于施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
109	上海市期货同业公会	2009 年	上海地区期货公司社会责任工作指引
110	上海市建筑施工行业协会	2009 年	上海建筑施工行业企业社会责任导则
111	山西省工业经济联合会	2008 年	山西省工业企业社会责任指南
112	广东省房地产行业协会	2011 年	广东省房地产企业社会责任指引(2011 年版)
113	陕西省工业经济联合会	2009 年	陕西省工业企业社会责任指南
114	安徽省工业经济联合会	2013 年	安徽省工业企业社会责任指南
115	四川省工业经济联合会	2016 年	四川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
其他机构颁布的政策文件、指南、规范			
116	上海证券交易所	2008 年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暨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的通知
117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06 年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
118	香港联合交易所	2012 年	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2015 年修订)
119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	2011 年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
120	山东女子学院与山东省旅游饭店协会、联合国妇女署	2016 年	饭店服务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标准
121	鄂湘川黔滇五省	2012 年	磷矿企业社会责任年度报告制度

参考文献

（一）法律法规与政府官方文件

1. 198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99 年修正）。
2. 199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 年修正）。
3. 199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修正）。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全国乡镇工业污染源调查基本情况公报》，《环境保护》1992 年第 2 期。
5.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2015 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报告》，2015 年 9 月。
6.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1997 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环境保护》1998 年第 7 期。
7.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1998 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环境保护》1999 年第 7 期。
8.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2000 年查处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和侵害消费者权益案件情况分析”，《中国工商报》2001 年 03 月 17 日，第 A02 版。

（二）著作与篇章

9. 张志勇：《中国往事 30 年》，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9 年版。
10. 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3 年版。
11. 熊贤良：“农民工问题专家座谈会摘要”，载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主编《中国农

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6 年版。

12. 顾益康："关于农民工有关问题的思考"，载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主编《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6 年版。

13. 梁荣，唐坤炎："90 年代中国乡镇企业发展的特点与原因"，《新东方》2000 年底 5 期。

14. 丁世和："加强产品质量监督，保护消费者利益"，《消费经济》1992 年第 3 期。

15. 王秋蓉："推动央企社会责任工作谱写新篇章"，《WTO 经济导刊》2018 年第 9 期。

16. 马茜，夏冰："社会组织是多元共治的重要力量"，《中国环境报》2017 年 4 月 25 日，第 3 版。

17. 郭毅，叶方缘："1998-2018 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18 卷第 2 期。

（三）网络信息资料

18. "1979 年 7 月 13 日，国务院决定扩大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载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historic/0713/2302.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5 日）。

19.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8-12/18/c_1123872025.htm（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5 日）。

20.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载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chinese/archive/131782.htm（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6 日）。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载中金国研智库网，http://www.zjgyzk.cn/fazhanguihua/china.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6 日）。

22. "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71380/71382/71386/4837883.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6 日）。

2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载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7-10/27/c_1121867529.htm（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6 日）。

24.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116/c1001-23560979.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6 日）。

25.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载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40531/40746/2994977.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26.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载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chinese/archive/131659.htm（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27. “改革开放 40 年乐清市工业经济发展研究”，载乐清市人民政府网，http://www.yueqing.gov.cn/art/2018/5/31/art_1347884_18419126.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6 日）。

28. “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网，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2/13/content_5147412.htm（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29. “1994 年劳动事业发展年度公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网，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wgk/szrs/ndtjsj/tjgb/201107/t20110723_69883.htm（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30. “1999 年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网，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wgk/szrs/tjgb/200602/t20060207_69892.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31. “2001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官网，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b/200801/200801150093949.s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32.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我国城市污水处理能力有待提高”，载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027/2620816.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33. [美] 玛丽·米克尔：《2019 年互联网趋势报告》，http://www.cbdio.com/image/site2/20190612/f42853157e261e6ae9825a.pdf（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34. 阿里巴巴集团：“2017-2018 阿里巴巴集团社会责任报告”，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9/0424/6205030120002024.shtm（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35. 廖晓淇：“敦促中国企业走出去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载新浪新闻网，https://news.sina.com.cn/o/2006-02-22/13038274294s.s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36. 韦燕霞：“建设以人为本的合谐企业”，载纺织网，http://www.texindex.com.cn/Articles/2007-12-21/123160.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37. “2012 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发布，捐款总额连续两年下降”，载中国财经网，http://finance.china.com.cn/roll/20130922/1826614.s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38. “《广东省基金会发展趋势分析·2012》报告显示：广东企业基金会数量全国领先，基金会从运作型向资助型转变”，载南方日报网，http://epaper.southcn.com/nfdaily/html/2012-12/13/content_7150760.htm（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39. 郭沛源：“汶川十年 看企业救灾”，载 21 世纪经济报道网，http://epaper.21jingji.com/html/2018-05/31/content_87239.htm（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40. 李予阳：“2014 年内外贸成绩单亮眼：国内消费给力 对外投资发力”， 载中国经济网，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501/22/t20150122_4400732.s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41. 郭沛源 杨方义：“中国首单社会效应债券评析”，载中国金融信息网，http://greenfinance.xinhua08.com/a/20161229/1678839.s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42. 杨毅：“我国累计发行扶贫债券已超 2918 亿元”，载中国金融新闻网，http://www.financialnews.com.cn/sc/zq/201808/t20180803_143393.html?from=singlemessage（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43. “万企帮万村”惠及近千万贫困人口“，载中国统一战线新闻网， http://tyzx.people.cn/n1/2019/0419/c372194-31038409.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44. “习近平出席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网，http://www.gov.cn/xinwen/2018-05/19/content_5292116.htm（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45. 杨梦晴：“新环保法效果评估：信息公开仍不理想”，载南方周末官网，http://www.infzm.com/content/124280（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46. 新《环境保护法》实施效果评估课题组：“新《环境保护法》实施效果评估报告”，载人民网，http://legal.people.com.cn/n1/2016/0526/c42510-28380348.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47.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官网，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2/201808/t20180803_629536.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48. 鲁政委，汤维祺：“兴业研究：2017 年中国绿色金融市场综览”，载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官网，http://www.greenfinance.org.cn/displaynews.

php?id=1880（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49.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4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902/P020190318523029756345.pdf>（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50. 商务部：“2018 年农村网络零售额 1.37 万亿元”，载央视网，http://news.cctv.com/2019/02/22/ARTIGepl7CqYCda8VEsxUK82190222.s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51. “央企担当，国家力量：中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官网，http://www.sasac.gov.cn/n2588025/n2588134/c8549345/content.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52. “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载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2-09/08/c_113005563.htm（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53.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任建设推广委员会：“百家纺织企业倡议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建设”，载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官网，http://www.csc9000.org.cn/news/responsibility/2016-06-15/11.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54.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载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4/27/c_1124425237.htm（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20 日）。

55. 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11/01/c_1123649488.htm（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20 日）。

56. “中国消费者协会：协会地图”，载中国消费者协会官网，http://www.cca.org.cn（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20 日）。

57.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基金会中新网：“慈善与可持续发展——中国行动”，载”慈善与可持续发展——中国行动”官网，http://sdg.foundationcenter.org.cn/about.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8 月 20 日）。

在中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积极致力于人类发展事业，提高人们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作为联合国的发展机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利用其丰富的国际经验，帮助中国寻求对发展调整的切实途径。通过建立伙伴关系和不断创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消除贫困，加强法制，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以及防治艾滋病等一系列工作中，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公平的小康社会而不懈努力。

本报告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相关研究团队共同合作撰写完成。特别感谢本报告的主要赞助方及媒体合作伙伴凤凰卫视的慷慨捐赠与支持。